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鲍 闽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陈伙金	鲍 闽
	林 山	陈章汉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59 期 2018 年第 6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鲍 闽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黄炳敖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 (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坊巷漫步

P28



图说福州改革开放 40 年

P49

直笔人间
——记史界才女陈懋恒



世味流年

4 海 男

坊巷漫步

史池钩深

7 杨济亮

沧桑十万里，大海造传奇

双塔视野

14 高健斌

钟紫云的荣耀与尴尬

22 刘广定

记“八一四”笕桥空战关键人物刘崇佺

闽都记忆

28 林振寿

图说福州改革开放 40 年

33 林 山

旧物新拾（二）

走笔螺洲

37 楚 欣

人杰地灵话螺洲

43 郑 芳

末代帝师陈宝琛家族的五代传奇

49 陈 三

直笔人间

——记史界才女陈懋恒

Contents

P67



福州话之美

P72



方寸之间天地宽

P75

玉湖金峰



闽地风情

- | | | |
|----|-----|---------|
| 57 | 张小菁 | 悠悠一脉琴江情 |
| 62 | 李善旺 | 远洋鼓山边 |
| 67 | 游德馨 | 福州话之美 |

三山书人

- | | | |
|----|-----|------------|
| 69 | 林玉山 | 品读《一个人的世界》 |
|----|-----|------------|

艺术档案

- | | | |
|----|-----|---------|
| 72 | 青 山 | 方寸之间天地宽 |
|----|-----|---------|

十邑风采

- | | | |
|----|-----|--------|
| 75 | 戴云飞 | 玉湖金峰 |
| 80 | 郭永仙 | 好官唐学仁 |
| 85 | 曾建梅 | 闽地“边城” |

海丝海路

- | | | |
|----|-----|--|
| 91 | 林芳燕 | 砂拉越诗巫福州人再移民
——以澳大利亚珀斯及塔斯
马尼亚岛屿为例 |
|----|-----|--|

- | | | |
|----|-----|---------|
| 封二 | 林任菁 | 风轻系列之十一 |
| 封三 | 林培松 | 星安桥古韵 |

坊巷漫步

海 男

安静，请珍惜上苍赐予我们的好时光，在安静中你才会有时间漫步，去看一朵花怎样绽放，看一群鸟怎样彼此召唤。只要你出门，踏上了旅途，你就进入了人文地理的索引之中去探访某个离你遥远的渊薮。走在福州三坊七巷中，我们的脚抬起来又落下去，当整个世界正在被大面积的拆迁改变了古老的面貌时，三坊七巷却在无数次的时间浩劫中保留了如此真实的样貌。于是我们可以感伤而激动地漫步其间，从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再进入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

三坊七巷以建筑之完整而真切地保存了逝去的时光，它是福州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核心区域，集中地彰显出了从海湾凸起的福州盆地之上历史的渊源，细数这渊源，可以揭开层层幕帷，去看我们的先人是怎样寻着海风的呼啸开始了南迁之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无疑是一部复杂纷繁的迁徙之史。晋唐以来，在我的故乡云南，首次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之下的土著们因战乱而向云南迁徙，之后是洪武年间江南中原的将士向云南迁徙。在福州的三坊七巷我又遇到了从晋唐以来的迁徙史迹……





迁徙总是发生在各种战乱的历史背景之下，移民是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幕史诗大剧。漫步于青灰色的石板路上，尽管我们知道，这些脚下的石板中镶嵌着无数个世纪交替之光影，你无法说清楚哪一块石板是宋朝的，哪一块又是元朝的，明代的，现当代的……但漫步其中，每一幢建筑之

上都镌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话语，就像这渺茫的宇宙间，唯有心灵可以隐蔽也可以呈现。

杨桥巷中有冰心祖居，郎官巷中有严复故居，塔巷中有王有龄故居，还有黄巷、安民巷……每条深巷中都曾回荡着古人先辈的遗迹，我仿佛看见他们在这些故居中所度过的或长或短



的时光，通往深宅大院中的幽光，仿佛映衬着官宦士族们的命运家谱，弥漫着名贤雅士们归隐书堂咏唱的满怀壮志。清代名宦林枝春曾题居所联曰：“庭余嘉荫，室有藏书，天下事随遇而安，即此是雕梁画栋。卜得芳邻，居成美境，田舍翁问心已足，漫言应列鼎鸣钟。”读此联，内心仿佛在静池中看见了蓝天和翠竹倒影。

漫步于三坊七巷中的旅客们，不断拍照留影，历史的遗迹通过建筑充分体现了美学和时间的融合。在一座座隔世的坊巷宅第中，我们看到了古代的高墙，它可以防御刺客、寒潮及不测的风云；定居于深宅中的一代又一代人可以沿袭古老的生活习俗，在此居所中守望家园并祭祀着先

辈们的灵魂；还有书斋，通向的无疑是世间明亮之路。

走在三坊七巷中的我们不仅仅在短促的时间中观看到了人间的世相大舞台，同时也从这些建筑中看到了听雨斋、澹静斋、香草斋、二梅书屋、翠微精舍、竹林草堂、冶山书楼、廉山精舍的形貌……漫步于榕、樟、松、竹、梅、桂、荔枝、龙眼、玉兰、蜡梅的花木世界，这些已经在时间长河中历尽了苍茫仍不衰的珍奇花木，在这些充满了名居名士的名园中保持着挺拔的身躯，它们将与那些雕栋楹栏中穿梭不息的状元、进士、翰林、会元、文魁、举人的灵魂相融，成为三坊七巷中永恒的传奇。

沧桑十万里，大海造传奇

杨济亮

1492年8月3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率领3艘百来吨的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扬帆出大西洋，经70个昼夜的艰苦航行，于1492年10月12日凌晨终于发现了陆地（属于中美洲加勒比海中的巴哈马群岛，他为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之后，他又登上了美洲的许多海岸。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比哥伦布早近百年，明王朝钦差总兵太监郑和率领的由27000余人、200多艘大小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就已经开始下西洋，而且他的助手福建人王景弘还曾八下西洋。这只船队到过占城、爪哇、旧港、满拉加、哑鲁、苏门答腊等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了今天东非肯尼亚一带。他们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万顷海洋中“沧溟十万余里”，英勇奋斗了近30年（1405—1433），这在世界航海史上是

绝无仅有的。

郑和下西洋是明初大规模外交活动的一部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明史》指出：“成祖疑惠帝亡，欲纵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930年，在长乐南山出土了“天妃灵应之记”碑，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在长乐驻泊期间所立。碑刻全文1177字，历述下西洋目的、意义，前六次下西洋经过、成果和第七次下西洋任务，以及在长乐修建寺、宫、殿和刻碑、铸钟的情况。碑文明确记载：“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他们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率领巨大船队七次下西洋，在太平港驻泊期间，驻军长乐十洋街，并在附近设水师辕门；在此修造船只，补充给养，招募水手，祭祀海神，做好远航准备。当时的十洋街上，来往着



“天妃灵应之记”碑拓片

海外各国的王公官员和商人，涌动着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的人流，市面十分热闹繁荣。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促进了明代福建特别是福州（包括长乐）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促进福建陶瓷业、丝织业发展

太平港是今长乐城西浮峰山下一个环形深水港湾。据《长乐县志》记载，明初的太平港，潮汐往来，水面辽阔，适宜大型船队停泊，便于船队“迎潮而出大江”。太平港周边高山屏峙，可以阻遏台风和东北风的侵袭，风平浪静，是天然良港。郑和舟师多次在夏、秋进驻太平港，少则两个月，多则 10 个月。当冬、春东北季风劲吹

时，郑和船队拔锚扬帆，出闽江口五虎门，转舵南下，浩浩荡荡下西洋，顺风 10 个昼夜便可到达占城（今越南中南部）。

如今这里早已成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新区。但摄于 1984 年的一张黑白照片显示，当年这里依然是一片水泊。1988 年，地质部门曾对这里进行勘探，并明确表示，“西区港床 20 米以下仍能钻探到瓷器碎片层。”在随后的开发建设中，还不断有人挖到船索、船碇等遗物。

在印度阿萨姆邦郑和本人到过的榜葛刺、加异勒、柯枝、花面和溜山等国都有中国明代瓷器。据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研究，元代到明代早期输往东非的瓷器，与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不同，那里大量发现的是福建地区瓷器产品。在肯尼亚的几处遗址中，也有一些元末明初或明代的瓷器主要是龙泉窑青瓷，其中也包括福建窑的瓷器，元明时期，福州地区的外销陶瓷主要有连江浦口窑的仿龙泉窑和闽清义溪窑的青白瓷，而福州港腹地的景德镇瓷器生产的规模随着郑和下西洋明显扩大。而闽南地区的德化窑白瓷和同安汀溪窑瓷等越来越受到外商的青睐。郑和下西洋后，海路交通的拓展，使得发展起来的制瓷业受到了海外市场的刺激，大量的商人华侨出海贩卖瓷器。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从苏门答腊和渤泥带回的“苏麻离青”料烧制的青花瓷，惊艳不可方物，成为海外市场的绝对宠儿。

郑和下西洋也促进了福建丝织业发展。绢丝是郑和下西洋又一重要贸易品。当时除江浙一带

生产丝绸，福州也出产精美的丝绸纺织品。丝绸纺织品随郑和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各国。《闽部疏》载：“凡福之丝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海去者，尤不可计。”明弘治间（1488—1505），出于同江浙一带丝织业竞争，福州织工林洪创造了“改机”，把五层经丝织制的织品改成四层经丝织出的新品种，质地轻薄，纹饰简明，花地青白，织造简便。福州织绢也很发达，多在河东、河西街一带，至今还留下“织锻巷”“锦巷”“横锦巷”和“机房里”这些与纺织业相关的地名。

二、促进福建造船业和福船技术发展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时，朝廷屡命福建造船和修船。明永乐元年（1403）五月，福建为郑和船队造海船137艘，次年又造5艘供遣使西洋之用。这些在客观上促进了福州造船和修船工艺水平的显著提高。

福建福州沿海造船多，一个重要原因即福建境内多山，山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拥有造船的各种材料。如铁松、杉、樟、藤、棕、生漆、桐油、蛎灰等，这为福州造船业发展提供了条件。造大船，船底龙骨用楠木，舱杆用榆木、杉木，船舵用杉木，这些木料在闽江上游一带均可提供，至今闽北邵武、将乐等地，仍把参天树木称为“郑和木”，说明这些地方当时为郑和、王景弘

下西洋造大船提供过巨木。

福州有着悠久的造船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汉书·严助传》记载：“（闽）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备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说明闽越人善于伐木造船。建衡元年（269），在建安郡所属侯官县附近，设置“典船校尉”，而当时“领谪徙（罪人）造船于此”。东晋时，卢循曾据晋安海岛，建造“八槽舰”以抗朝廷围剿。唐朝初年，福州一带仍然生活着闽越国后裔的土著民族，他们的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海舟以福建为上”，北宋时，福州河口就有官办船厂。据《三山志》记载，船场所，在“河口弥陀院之南”。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闰六月，张浚条陈海道舟船利害，得到高宗的同意，随即在福州“大治海舟至千艘”。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也对当时福船的水密隔舱技术有详尽的描述。明代，当时制造的大型“福船”，亦称“宝船”，“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船上配有罗盘等。据《明史》和《瀛涯胜览》记载，郑和船队的宝船，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中号的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每船平均载四五百人，最大的可容纳千人，张挂九桅十二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舶。

在福州城，据派往琉球使臣夏子阳《使琉球录》的记载：当时“造船厂坞地在南台江边，中

有天妃舍人庙在焉……官府以雪峰寺田十五亩五分易之为造舟之所……中深而下为坞，以顿舟，坞之两旁则以堆置木材诸物与工匠等居之”。另外，泉州、漳州都有造船厂。由于郑和、王景弘远航的需要，造船和修船的工艺水平显著提高，并涌现大批能够打造宝船的能工巧匠。当时，南京龙江船厂制造宝船所需一部分技术骨干还是从这里调去的。《龙江船厂志》记载：“洪武、永乐时，起取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江苏）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指南京）造船，户籍于提举司。”这些造船的工匠被分为四厢：一厢的工匠，制造木梭槽；二厢的工匠，制造船木铁缆；三厢的工匠，修补旧船；四厢的工匠，制造棕篷等物。他们造出的宝船质量很高，不管从尺度、结构还是从装备等来看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在七次下西洋中均没有发生意外海损事件。

三、促进福建对外交流和移民

15 世纪初，郑和率庞大舟师七下西洋。每次奉使将士达两三万之多，其中不乏闽籍人氏。《重纂福建通志》有载：“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师返，闽中从征将士升赏有差。”可见当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闽籍将士升赏者甚众。据长乐《六里志·武功》记载：“黄参字求我，至德里黄李人，明永乐七年，太监郑和驻长乐造舰下西洋，参从征有功，授忠武尉，累迁游



郑和宝船模型

击定远将军及和总管府中军。”闽县人严观“以（下）西洋功”升任百户，连江人王通保和陈连生也都因此授“试百户”。据《闽书·武军志》所载，从征升擢的弁兵，属于福州中卫和福清镇东卫的就有 16 人。然而，迄今“可考的闽籍将士不过五十二人”，尔后偶有发现。

很大一种可能是，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返回福建，而是留在东南亚当地。明初，朱元璋曾说：“福建兴化卫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如彼所为者乎。”已经有卫所官兵卷入了走私贸易。朱元璋随后采取的海禁政策迫使中下层的卫所官兵及其家属出于生计谋划，纷纷搭上郑和船队这一“便船”出海，在船上先为官家做事服务，下船上岸后则成自由身如龙入海。比如郑和船队上的铁锚、木舱修理工匠，以及通事（即翻译）、医生、书算手、舵工、火长，很多就是从福建当地招募而来的。

福州商人到海外经商的也不少。元代文学家刘仁年，浙江天台人，官温州路总管，曾来福州

旅游，参观了钓龙台及郊区竹屿等处，著有《羽庭集》。他看到福州人之漂海入番，有十余年不归，其妻诉之，乃述其言为赋，其中有“海南番船尽回乡，不见侬家薄幸郎。欲向船头问消息，荔枝树下买槟榔。当时郎著浅番衣，浅番路近便回归。谁知郎入深番里，浪逐鸳鸯浅水飞”。元代藤山人、文学家吴海与邻人也谈及南台人出国经商发大财的事情。（吴海《闻过斋集》卷三《知止轩记》）另外，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和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书已出现大量的非洲地名，是闽人航迹的忠实记录。

因为福建人对造船、航海路线、技术的熟稔而且不少通各国语言，所以郑和不但招聘福建人做通事（即翻译）、舵工、火长，还让福建人担任舟师的要职。“乃以针经图式付于领执，专一料理”，针经就是以罗盘和牵星板来向导航海。当时，福州府各县有一些人跟随郑和、王景弘的船队当水手或作为使节前往南洋一带，留居北加里曼丹、菲律宾、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马欢《瀛涯胜览》以及《郑和家谱》中均提到，郑和使团中有一名专管天文、占候的阴阳官林贵和，就是福清人。“贵和通易，善卜巫之说，国朝永乐朝，五从中贵人（郑和）泛西域，入诸夷邦……往返辄数十年，竟无恙”。闽侯县世美《吴氏族谱》记载：“吴兴……永乐二年三月，奉令钦差太监郑讳和，三宝太监，进征西洋等国。”黄参还推荐许多乡亲进船队参加远航。当时郑和、王景弘在长

乐活动过的洋屿、猴屿、浮歧、潭头、祥州、井尾、龙门、首占、黄李等地方，都成了海员、华侨较多的乡村，后来长乐被称为“海员之乡”“华侨之乡”，就与此有关。

明洪武元年（1368），不少福清人前往菲律宾，“闽人以其地富饶，商贩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他们在当地主要从事商贸和手工业。当时，福州人走私出海贸易甚多，《闽都记》载：“明永乐时，福州商人赴麻喇国（马六甲）者，有阮、芮、朴、樊、郝等姓氏，住居多年，娶番妇生子，率之返国。”此外，闽南、莆田、清流、汀州都有经商者移民东南亚。东南亚华侨社会迅速发展，在爪哇和吕宋诸地的中国商人基本上是沿海一带的广东、福建商人。16世纪时，暹罗（今泰国）华侨聚居之处被称作“奶街”。

东南亚和西洋各国来访者，也跟随郑和、王景弘的船队或乘本国的船只或由陆路来到中国，他们多会途经福州。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永乐六年（1408），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率其妻子家属陪臣来朝，泊福州港，守臣以闻，上念王距中国数万里，远涉鲸波而至，遣中使偕礼部官往迎劳之，所过诸郡，皆设宴。”又如《罪惟录》记载：“永乐十八年，古麻刺朗国王干刺义亦敦奔（一云哇来顿本）率其妻子陪臣来朝，予敕封王。归次福州，卒，赐谥‘康靖’。敕葬闽县，有司岁祀。”麻刺朗国，音似马尼拉，所以很可能是古代菲律宾棉兰岛上的小国，其国王所葬

墓址在今福州西郊凤凰池村茶园山。还有古里国（今印度西岸）使臣葛卜满曾居住福州，其后裔葛文明在明嘉靖年间主持重修了清真寺。

四、促进了福州长乐城市商贸繁荣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每次都经过闽江口一带，船队驻泊在长乐太平港，他们在这里补给航程所需物品，同时也带有闽中货物运往诸国，有的就在长乐等一带进行交易，这些都促进了福州地区商业的繁荣。《长乐县志》有“适三宝太监驻军十洋街，人物辏集如市”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当地商贸的盛况，福州港成为明代重要的贸易港口。

为了供给郑和舟师累泊福州港期间和郑和七下西洋途中所需粮食，官府专门在闽江口的梅花千户所城东门建立三廩储存军粮的“长乐仓”，还调拨了各省库银，官军护送，由福州港登舟。福州冶炼业发达，明代时设有铸造钱币的机构，郑和下西洋与西洋通商贸易使用的“永乐通宝”很大部分是在福州铸造的。当然，素有盛名的福建盐、油、糖等，也是船队的生活必需品。此外，郑和船队所带的商品有金银、麝香、印花布、色绢、缎匹、苧丝、青花瓷器、烧珠、铜铁器物、水银、雨伞、草席、樟脑、龙茶、瓷器、丝绸等40余种货物，其中许多就是在福建就地采购装运上船的。除满足船队需要，也有部分商品投放民间市场，准予商贾买卖。所谓“小民持一二钱

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在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影响下，民间也大造船只。他们冲破“海禁”的阻力，驾船出海贸易。嘉靖年间，福州甚至出现了不少亦商亦盗的海商。

同时，番国使者来到福州港，除了向朝廷纳贡，也会和港内的各路商人进行易货贸易，转手买卖，各取所需，以致福州城内河口一带华夷杂处，商贾云集，盛极一时。为专门安排日益增多的番国使臣和贸易者的住宿，官府还在那里建造了进贡厂、柔远驿等。由于福州水陆交通发达、内外贸易繁荣，而且中琉贸易航海的水手船工多为福州河口人，明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置到福州。

郑和下西洋，除了带回狮子、麒麟、犀角、宝石等奇珍异宝外，还带回各种南洋的香料，如没药、安息香、丁香、芦荟、乳香、血竭、龙涎香、苏合香等；后来，有些华侨从海外归来，也引进了一些农作物，对我国的粮食结构的变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明万历年间，旅居吕宋（今菲律宾）的华侨陈振龙，将原产中美洲的番薯种从海外带回在福州试种，并取得成功。另外，东南亚的鱼翅、燕窝等也通过华侨引入中国，成为闽菜食品之一。

郑和下西洋虽然是用扩大朝贡贸易来抑制私人海外贸易，但它毕竟打开了明初厉行海禁的缺口，拓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西洋乃至整个海外的影响。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下，海上私人贸易禁而不衰，明王朝不得

不在隆庆元年（1567）依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两年后，隆庆三年（1569），澳门成为中葡贸易的口岸，使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盛况一直延续至清代。

五、促进福建地区的宗教文化建设

郑和船队可说是一支“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船队”，在船队中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种，郑和也因应了这种局面，对佛、道、伊等各教采取了平衡宽容的态度。

天后是闽人的信仰，也是郑和下西洋的精神支柱。自从郑和下西洋回国，以海上平安，为天妃神灵感应所致，奏闻于朝，建龙江天妃庙之后，沿江沿海一带普遍建立天妃庙宇，并遣使致祭。另外，郑和还修建了长乐南山三清殿，在连江粗芦岛的熨斗山上设坛致祭南海神，还曾重建了于山九仙观。

郑和也是一名佛教徒，1403年，他由姚广孝主持受戒为佛弟子，法名福善。他曾监修过南京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与寺僧修长乐三峰塔寺、重建洋屿云门寺，还将从海外带回的两个瓦塔置于闽侯雪峰寺前。

郑和是穆斯林，他率领的船队中有一大批穆斯林，如同列正使太监的王景弘，通事马欢、蒲和日，指挥同知哈知，副千户沙班等。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曾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为自



长乐三峰寺塔

己和随行的穆斯林寻找精神寄托和心灵的安慰。后授封为泉州卫镇抚的蒲和日，专为此事立了郑和行香碑。

郑和以供奉不同神祇等办法，团结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众，目的就是激励船队部众完成下西洋的伟大历史使命。今天在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佛教化、道教化、回教化的郑和庙（又称之三宝宫庙）和随行人员的庙宇等宗教遗迹，已构成当今东南亚民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钟紫云的荣耀与尴尬

高健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岁次乙未，孟冬上旬，大清闽安水师副将钟紫云站在新落成的闽安水师副将衙门前，看着雕梁画栋、粉墙黛瓦，听着耳边钟鼓齐鸣，欢声雷动。志得意满的他或许会看着自己撰写的《重修闽安镇协署碑记》，吟诵再三：

闽安之为镇，当省会咽喉。总建、邵、延、福四府之水，汇江流直激而深。距镇二里许，为其口门。南北岸两山雄峙，其来势各蟠耸百数十里。口门外，敞然洋面。明季海禁解网，濒海为墟。国朝顺治间，沈阳范公持镇节，戡夷闽乱，建署其地，环之石城。规立水师营汛，以钤辖内外洋，岛夷警栗者二百余年焉。甲申法之役，予率援南下，驻师南北岸。时炮垒凭依山麓。因其地之高下，凿伏道，塞险隘，填坎塹，浚沟池。防御者，亦周且密焉。及视凭山之故垒，环镇之城台，相与声援而策应。若予所极力经营者，第差补其缺然。甲午秋，东师

南突，授予闽安篆事，寄专防务南北岸三炮台，遏截水路而趣省之旱道。长乐总其南，连江总其北，即长门口横迤海上。今所称天塹者，皆得居中而左右顾之。会今市开重译馆，远人于台澎海疆，无事则已，有事闽洋首受其冲。闽安一镇遂为东南之藩蔽。范公建署时，天下亦大定矣，外夷尚宾服矣，而其揆合数百年后之变故，有若烛照者，何其神也。迄今范公往矣。署舍值倾圯矣。予仍厥基址重新建造。不事亭台楼阁之壮丽，园囿陂池之清幽。所为堂焉，室焉，廊焉，庑焉者，科书之房舍，军械之藏储，材官武勇辈所居止，以及庖廩匠作诸舍，无一不求完备。至于署之前炮台凭焉，署之侧较场次焉，城镇之内江战舰集泊焉。又得与僚佐士卒相习相亲，日夕讲求而训练焉。后之人而亦与范公同志，当识予之踵事范公者，非第规规一署之为也。

光绪二十有一年岁次乙未孟冬月上浣谷



重修闽安协署碑

旦福建闽安水师协镇都督统领恪靖亲军炮队营南北岸沪屿魁岐各炮台议叙加一级略勇巴图鲁湘阴钟紫云撰并书。

—

钟紫云确实有理由得意。

钟紫云，湖南湘阴县三塘乡新兴村人。谱名昌珍，字紫云，号祥开。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初四日生。同治元年（1862），年方 17 岁，

就投效长江水师，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转战湖北、两江等省。其后，他投奔到晚清洋务重臣、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麾下。几年时间，历任陕西汉中镇属黄泥铺千总、署汉中镇属佛坪营守备，历升留陕尽先补用游击。光绪五年（1879）二月十五日，左宗棠以其“战阵勇往，办事实心”，保奏借补土门堡守备员缺，先给署札。着绩递保花翎副将衔留甘尽先即补参将。光绪六年（1880）间，经左宗棠奏准借补宿州咨先给升署副将，署甘肃肃州镇属赤金营都司员缺。旋即于新疆南路诸军五次剿平边寇出力案内保奖，光绪七年（1881）五月二十日奉上谕：“花翎副将衔、陕甘尽先补用参将钟紫云着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给略勇巴图鲁名号。”

经过多年历练，钟紫云成长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炮兵营将领。光绪九年（1883），追随已调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至江南，督带炮队正营及炮队副营。光绪十年（1884）四月，经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荃调派，守焦山及都天庙炮台。同年七月，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福建水师惨败。左宗棠临危受命，赴福州收拾残局。而作为左宗棠老部下的钟紫云，奉派管带恪靖亲军炮勇援闽，于七月二十六、七等日乘坐兵轮船，八月初三日至九江湖口，拔队换坐民船，取道南昌，由建昌登陆至光泽县，再由水路顺流而下，直达福州。驻师守闽安南北岸炮台。光绪十四年（1888），闽浙总督卞宝第呈报光绪帝的奏片中提及他光绪十年（1884）管带恪靖亲军炮勇操练巡防极为得力。

在这封应甘肃提督周达武咨请而作的奏片中，卞宝第请求以“钟紫云在闽督带炮队，熟悉情形，且久历戎行。精明强干，为将领中出色人员。将花翎尽先副将、略勇巴图鲁钟紫云开去甘肃肃州镇属赤金营都司底缺，照原保官阶改留闽浙尽先补用”。随即得到朱批“着照所请”。

从此，钟紫云扎根福建，开始他在八闽大地的戎马生涯。

光绪十五年（1889），江西客民聚众至顺昌大干地方滋事，钟紫云奉调前往助剿。其后便留于闽北。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初六，经闽浙总督谭钟麟奏请，暂委署理顺昌协副将，仍兼带洋口炮勇。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年，秋，“东师南突”，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朝北洋水师惨败。钟紫云于此危难之机，被题补为闽安外海水师协副将，但因管理南北岸炮台兼带恪靖营勇驻防海口，无法前往送部引见，先领署札。次年三月，原本不归闽安副将管理的魁岐炮台也划归钟紫云兼管。不知不觉，钟紫云已年至半百，军旅生涯也已有33年之久，终于官至副将。按大清官制，副将为从二品武官，已是一方大员，可算是步入高级将领之列了。

新官上任，钟紫云当然想励精图治。一方面整顿营伍，禀揭撤任鸦片嗜好太深、遇事疲缓的闽安协标左营守备陈有才。另一方面，重修闽安协台衙署。从《重修闽安镇协署碑记》可以看出，钟紫云重修衙署，并非是想贪图士大夫般的雅趣，而是以军人的思路构建武备。并且，钟紫



修复中的闽安协台衙门

云毫不讳言，他的这些作为是为了向闽安首任最高军事长官沈阳范公致敬，其中亦有不遑多让之自我期许。

二

钟紫云碑文里只敬称“沈阳范公”，没有写出完整的名讳。或许当时，他认为这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情，哪里会想到，事过境迁，百年后，却会变成一桩学术公案？

进入21世纪以来，闽安渐渐引起各界人士注意，“沈阳范公”其人，开始被考证为范承谟。其说大抵如下：范承谟为清顺治九年（1652）进士，累迁秘书院学士。后南下从军，任福建总兵。顺治十五年（1658），范承谟领兵驻闽安镇，改建巡检司衙门为协台衙门，史称“总兵署”。范承谟从闽安海关调取资金，进行大规模攻防设施以及福建闽安水师营的建设。建成闽安

镇石头城、开辟校场、修复员山水寨，并修建多处炮台。顺治十八年（1661），回京任国史院学士。康熙十一年（1672）擢任福建总督。翌年，撤藩令下，从漳州移驻福州，与耿精忠斗智斗勇。耿精忠胁迫范承谟同反，范承谟骂不绝口，被拘押在闽安镇员山水寨土室两年多。至康熙十五年（1676），耿精忠见大势已去，准备投降。担心范承谟揭露其罪行，将范承谟缢死，焚尸抛之荒野。范承谟旧部泰宁骑兵许鼎，夜负遗骸隐藏，在耿精忠投降后的次年背负范承谟遗骸上京。康熙帝闻奏，遣内大臣及侍卫迎奠，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贞。葬于北京郊外。康熙十九年（1680），耿精忠伏诛。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御书碑文，命在员山水寨立碑纪念。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福建民请，康熙帝批准建范公祠于福州乌山，御赐“忠贞炳日”匾。此外，在员山水寨另有一碑，文曰：“康熙十五年九月己酉朔甲子福建总督、加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贞范承谟殉国处。”

如此可歌可泣的人物和闽安关系密切，自然与有荣焉。流风所及，甚至连闽安著名的迴龙桥桥头立有的一块“沈公桥”碑，都被好事者不顾繁体中“沈阳”之“沈”与简化字中“沈”字全然不同，牵强附会地解释为：沈阳范承谟重修了迴龙桥，所以老百姓感恩，改称为沈公桥。

如果钟紫云复生，看到这等说辞，大概会尴尬不已。

因为，他的碑文中所颂扬的“持镇节”的

“沈阳范公”，和范承谟没有任何关系。据《清实录》，范承谟“初任侍卫。顺治八年（1651），更定八旗汉军考试之例，承谟中式举人。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十二年（1655），迁秘书院侍读学士。十八年（1661），圣祖仁皇帝御极，擢国史院学士”。从中可知，范承谟在顺治八年（1651）之后完全走的是文官路线，不可能出任闽安副将。而如果在顺治八年（1651）前他就已是二品的武职副将，也不可能于顺治八年（1651）去参加乡试考举人。

事实上，大清闽安第一任水师军事最高长官，名讳为：范绍祖。

范绍祖，辽东人。崇祯十七年（1644）时，已任钦差正勇营防剿凤泗等处总兵官太子太师后军都督府左都督加三级黄得功标下副总兵官。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南京城破。时任弘光政权总兵官的范绍祖降清，随后随清军征战安徽。顺治三年（1646），范绍祖经洪承畴分派随征进攻浙江。顺治三年（1646）七月十二日，率部进入温州。其后清政府定浙江经制，裁撤总兵官，范绍祖改任总兵管副将事。顺治六年（1649）担任严州城守副将。其后，继续随军南征入闽。

顺治七年（1650），清政府定福建官兵经制。十月，被任命为署都督佥事管福州水师副将事，驻扎在闽安。在闽安任内，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先后招降南明都督静洋将军张英、都督挂印总兵阮述、阮玉及荡湖伯阮美等将

官多名，兵员数百，缴获大量船只、军械、印信等。由于其时战事频仍，范绍祖长期征战在外。顺治九年（1652）六月二十二日泉州石头城之战，范绍祖统军被分派作三阵。战事起，清军溃败，纷纷弃船而逃。范绍祖登岸，于南门外一战，擒贼苏美郎等，杀其数贼，获犁铧船一只，军械若干。为此次大败中唯一的小胜。

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经洪承畴奏请，范绍祖从闽安调任湖广洞庭湖水师副将。十月，因顺治九年（1652）泉州石头城之败追责，逢赦免罪革职降三级照旧管事，仍令戴罪图功自赎，负责操练洞庭水师。顺治十五年（1658），洪承畴进攻南明永历政权，因“常德至辰州水路险远，一切粮饷皆由转运”，为“三军命脉所关”，因此命范绍祖亲领全营水师官兵1200名驾领沙船哨船往来辰河防护，用济军食。顺治十六年（1659）三月，调任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军前管中营副将事。康熙八年（1669），任山东临清副总兵。此后情形不详。

三

对于“沈阳范公”的误读，毕竟是后人的责任。不过，在碑文中，倒还真有一处切切实实的错误，或许会让钟紫云略觉尴尬。

碑文中介绍范公事迹时有一句“环之石城”。大概当时钟紫云撰写碑文时，觉得范绍祖作为清朝第一任闽安最高军事长官，修建镇城是

理所应当之事，可惜事实却偏偏不是如此。

范绍祖在顺治十一年（1654）就被调离闽安。而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郑成功于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进攻闽安镇时，“贼之攻闽安也，镇无城，筑土堡为固，贼猝破之”，“十三年成功犯闽安镇，镇无城，众保土堡”，可知，在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时，闽安镇尚未有石城，只有土堡。郑成功夺取闽安后，也并未修建石城，只是在原有土堡之外，又修建了几座寨堡。

闽安镇的石城，是在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清军水陆并进，从郑成功军队手中重新夺回闽安后，由当时的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耿介负责修建的。“值王师水陆并进，恢复闽安。盖闽安为八闽门户，旧因无城，为寇所盘踞，遂调福清、长乐、连江、罗源四县夫役工匠，创建表里石城三百六十余丈，修造营房二百间”。

当然，钟紫云也大有理由为自己辩解。因为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修《福建通志》时，修纂者在列举清朝总兵以下武官时，就记载“康熙十三年，经耿逆变乱，册籍无存”。可见耿精忠叛清再归降之间，除杀了范承谟，还将原有的官方档案毁之殆尽。光绪二十一年（1895）追忆200多年前的顺治年间旧事时，因史料册籍无存，偶有所误，亦在情理之中。

四

说“环之石城”或许会让钟紫云觉得尴尬，

只是后人的假设。钟紫云生前根本就不知道此处有误。在志得意满地修完闽安协署、立碑记功之后，他继续在飞黄腾达的道路上狂飙突进。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闽浙总督边宝泉以“建宁据闽省上游，为江浙孔道，山径纷歧客民麋聚。匪徒每涵迹其间，藉端滋事，非勤明干练熟悉情形之员不足以资镇摄。而钟紫云勇敢有为。勤明笃实，前在上游管带营勇，分防有年，戢暴安良，纪律严肃，声望素着，舆论翕然”，奏请以其委署建宁镇总兵。十一月初七日，奉上谕，建宁镇总兵以钟紫云补授。至此，钟紫云升任为正二品的总兵。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筹议练兵。闽浙总督许应骙因素闻钟紫云声名，抵闽后又叠加

体察，深悉其忠诚勇敢，练达精勤，凡所部各营皆纪律严明，技艺娴熟，治军有法，谋勇兼优。因此调钟紫云驻省，统领新设的福强全军。统领延平、建宁、邵武、福宁四府之镇武二练旗、定海一练旗、霆庆二防旗、恪靖福靖凯字三防旗以及省城全福三练旗、恪靖威营一哨并督标内河水师绥字凯字等炮船；原带之恪靖亲军炮队亮字左旗弁勇也调省督同各军认真操练；督标水师营、闽安左右营、福宁左营、烽火营等练兵以及南北岸沪屿、狮鼻嘴、魁岐、中浦、林浦等处炮台亦归其兼统。并兼办营务处。在此期间，钟紫云办理了筹防长门添设炮位及挖濠开沟、安放水旱雷事宜，密为布置既无防营又无炮垒之通商口岸福宁三都口事宜。此外，还于省垣南校场东偏盖造

兵房 100 间，使各弁兵得以栖止。

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二十二日，闽浙总督许应骙奏请以钟紫云委署理福建陆路提督。钟紫云当即将所统营务交代清楚，自省启程于十月初八日驰抵泉州城，接印任事，兼统福锐全军。陆路提督，已是从一品，是武官最高之品级。钟紫云以正二品总兵身份



闽安城墙（20 世纪 90 年代仍保存于闽安城隍顶的城墙） 陈朝军 / 摄

署理此职。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钟紫云接准督臣许应骙电咨，晋省商筹防务，于五月二十六日带陆路提督印起程。六月初一日至省筹办防务，统带福强全军，布置一切，所有提督衙署日行文件暂委中军代印代行，紧要公文包封递省核办。并添募楚勇四旗，编为祥胜军归其统带。受命接任长门统领，

及福毅中营弁勇，电光山、七娘湾各炮勇亲兵。并将祥胜军正中副中前右后五营弁勇由省调驻长门金牌一带海口扼扎。于九月二十六日带印到长门接统扼扎训练。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划鳅炮勇亦归钟紫云管带。九月，闽浙总督许应骙遵旨筹议改练新兵。以其时闽省兵力虽不少，但唯有署提督建宁镇总兵钟紫云所部祥胜军、候补道孙道仁所部福胜亲军练习洋操、营规整肃、堪备缓急，奏请以此两支部队为基础设常备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二十六日，钟紫云交卸署陆路提督印务。十月初六日，在长门防次承接闽浙总督臣许应骙照会接署福宁镇总兵。十月二十一日接印任事。仍统长门福毅各军及各炮台炮勇，以固海防。十二月，闽省设常备军计两镇八标二十四营。以祥胜军编为右镇，派钟紫云统领，驻扎长门海口。



修复后的闽安协台衙门

短短几年间，钟紫云从副将至总兵，署理陆路提督，署理福宁镇总兵，而且，在改练新兵的过程中，大权在握，坐拥重兵。这固然有他自己能力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遇上了特别赏识他的闽浙总督许应骙。

然而，也正因为钟紫云与闽浙总督许应骙关系亲密，福祸相倚。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二十六日，御史李灼华奏参闽浙总督许应骙贪污卑鄙事宜。清廷派令张之洞彻查此事。据张之洞《查明许应骙参款折》中记载与钟紫云相关内容如下：

“总兵钟紫云统带福强军皆为该督臣所信任，至以巨金结纳及具摺拜门等事查无确据。原奏所称武职（买差买缺）多由钟紫云经手，无从得其实据。钟紫云以实缺福宁镇总兵驻守长门，为该督臣所倚任。访诸舆论，尚无缺额吞饷及广

收贿赂情事。惟闻该员于该督臣谄奉殷勤不免过当，查无公然馈献实据。原奏所称优人名紫云者，钟紫云进之该督，该伶终日女妆出入督署。查省城优伶有名紫红者，年齿已衰，查无出入督署之事。以上各节据委查道员胡延、郭道直分条查访，尚属详悉。臣覆加查核。福宁镇总兵钟紫云早年统兵尚好，此时物议滋多，但查无卖差卖缺、吞饷受贿实据。惟以提镇大员专以逢迎奔竞、朋比交结为事。其营伍自不能核实整顿，势所必然。实属有忝专阃之职。应请旨将钟紫云开去福宁镇总兵之缺，留于闽省差委，以策将来。”

五月十七日，钟紫云交卸福宁镇总兵。

令钟紫云尴尬的是，尽管诸多举报均不实，但他的仕途至此戛然而止。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十七日午时，钟紫云郁郁而终，葬于湘阴县东门外范家坪金家塘，时年61周岁。

五

将星凋落，但故事却没有结束。

2012年的时候，笔者辗转与当时近九十高龄的钟紫云嫡孙钟在璞先生取得了联系。从他那得知：钟紫云60岁，老来得子。其去世后，在抗战期间，日军轰炸湘阴，钟紫云老宅被毁，其所遗文物、文献已荡然无存。所以其后裔对先祖的功绩已不甚了了。其坟墓亦于1960年间被盗掘。其墓碑作为当地水库出口的底板，至今沉在水底。



笔者（左）与钟在璞先生（2015年12月20日）

钟紫云重建的闽安协台衙门，虽然历经用途改变，为仓库、为小学，但总算屋宇尚在，是福建地区现仅存的一处武官衙门。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对其进行了数次维修，现已恢复原貌。由其撰写的原立于协台衙门内的《重修闽安镇协署碑记》，“文革”初期被凿断三块，作为虎头山溪渠的铺路石。2001年被发现，经拓洗组合，重置碑座，竖立于衙门前。从2009年开始，笔者开始从事闽安研究，几年爬梳，终于能完整地写出钟紫云的生平。

2015年12月20日，又逢乙未，仲冬上旬的最后一天，钟在璞先生特意带着在上海、美国的子孙重回闽安。如同120年前，他的祖父一样，站在面目一新、雕梁画栋、粉墙黛瓦的衙门前，看着高大厚重的“重修闽安镇协署碑”，拿着我为钟紫云将军撰写的生平，我觉得他们的心情是很欣慰的。我想，九泉之下的钟紫云将军，大概也会觉得欣慰吧。

记“八一四”笕桥空战 关键人物刘崇佺

（中国台湾）刘广定

1937年7月7日夜，驻扎北平西郊的日本军队以一名日兵失踪为由，攻击卢沟桥旁之宛平县城，引燃北平天津一带的战火，但遭遇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与反攻。日寇为求侵占华北的企图能速战速决，计划发动淞沪战事，进攻上海，以牵制中国军队北上，并攻占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威胁首都南京。于是又用其制造事件作为进攻借口的一贯伎俩，先于7月24日宣称有水兵在上海失踪，又于8月9日制造虹桥机场冲突，我保安队一士兵阵亡，但有两个日本兵被我军击毙。随之日人不断挑衅，同时增派军舰及军队到沪。8月13日上午九时一刻进攻闸北，保安队奋起还击。第二天，中国空军首次出战即获得了可观战绩，特别是笕桥空战击落两架敌机。1940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此次空军的战果，决定将每年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八一四”空战中的中国空军编队

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要员在南京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如果上海发生战事，立即封锁长江口，派空军轰炸江中日舰以阻其支援地面战争，故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中国航空委员会以空军总指挥周至柔、副总指挥毛邦初具名于下午2时在南京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指示空军参加淞沪会战。以“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为主任务，令“各部队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一切准备”，“各大队长（第七大队长除外）于14日10时到京，面授机宜。”

唯当时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濬（1890年生，

1937年8月26日被捕枪决)已被日本人收买,把军事委员会会议之决定告知日方。日寇连忙将长江内的商船军舰全部向吴淞口及崇明岛外撤离,并于13日晚间炮击上海。由于军情紧急,一方面由航空委员会于14日凌晨颁发《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以油印复制并派飞机送到各大部队;另一方面,蒋介石于深夜从南京打电话下令驻在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于拂晓前携带炸弹出击,轰炸在长江中游的日本军舰和轮船,但已经停在黄浦江里的,则不准轰炸,以免伤及他国船舰。

我国军机性能不如日机,空军的飞行经验也不如日军,且自14日清晨起,时有大风雨,但我空军各部队仍依作战令出发奋勇攻击日军阵地,原只负掩护任务之笕桥航校飞行教官组成的暂编队,也两度参加袭击。上午袭击设在上海日商公大纱厂内的日军军机库。第二大队由副大队长孙桐岗率机自安徽广德起飞,轰炸公大纱厂之飞机场及蕴藻滨、吴淞口一带敌机。五大队队长丁纪徐率机自江苏扬州起飞,轰炸长江口日本军舰,一枚炸弹命中一艘驱逐舰之舰尾,我机皆无损失。

令人惋惜的是下午再次出击时,轰炸日军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兵营的五大队第二十四中队副队长梁鸿云遭敌机袭击,身受重伤,勉强驾机降落后不治殉国。又二大队轰炸日军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处时,1408机中弹,后座任云阁殉国,驾驶李传谋(一说是祝鸿信)重伤但仍返航至常州坠地。又因日方之高射炮火密集,一架中国轰炸机因弹架损坏,炸弹落在大世界游艺场



笕桥机场

前,市民死伤多人,是为憾事。

很可能《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亦遭泄露,负责上海方面作战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古川清于13日晚下令各航空队于14日发动攻击,目标以轰炸上海附近的中国空军机场为主,企图消灭中国空军。唯14日凌晨开始天气甚差,海面上的航空母舰受台风影响无法起降飞机,驻扎九州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也无法起飞攻击。或因《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未泄露,长谷川清于14日清晨5时30分,下令在未放晴前暂停攻击。不料,中国空军自14日清晨起就冒着风雨不断起飞轰炸日军阵地及船只,使他决定不顾天气,于上午11时40分令驻防台北松山机场的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所属之鹿屋航空队派机轰炸中国空军笕桥及广德机场。

鹿屋航空队于14日中午接到作战命令。下午1时左右,第一批9架三菱“九六陆攻(陆上攻击)”型战机起飞,飞向广德轰炸。各机携带500磅炸弹2枚,但都没有驱逐舰(战斗机)护航。空袭机队于永嘉附近进入中国领空,由于天候恶劣,飞机编队不易,两队敌机最后都变成分

队或单机飞行。杭州空袭队于下午4时许到达目标区上空，广德空袭队则于下午5时40分左右抵达目标区。空袭杭州的日机在空中遭遇从河南周家口（现名周口市）机场飞来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遂起空战。

八一四笕桥空战

当时，高志航为大队长的第四驱逐机大队原驻江西南昌，“七七事变”后调驻河南周家口准备支援华北战场。13日，他接到《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后，考虑到天气不好，恐第二天清晨无法前往南京。恰好有民航机因避雨暂停周家口，他就搭此民航机经汉口前往南京，因为并未接到《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由于四大队远在周家口，这份命令中并未交付四大队任务。14日上午高志航得知第二号命令后，乃要求参加作战，获准，命第四大队飞杭州笕桥机场待命。

高志航即以紧急电报通知在周家口第二十一中队中队长李桂丹，转达这道命令。第四大队的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三个中队，接到大队长的电报后，于午后1时左右依序起飞。这天天气很坏，雷雨交加，但为了参加抗日作战，依然冒险航行。由于天气恶劣、能见度甚低，各中队以军机跟踪队形飞行，最后各队失去联络，分别向杭州飞行。

14日下午华东地区风雨交加、乌云密布，笕桥机场因大雨到处积水。笕桥航校教官组成的暂



高志航

编大队已于下午3时50分出发轰炸日军阵地。4时许，机场方面接获空袭警报，机场内剩下的飞机纷纷升空疏散。四大队二十一中队的飞机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600多公里）飞行，从河南周家口赶到笕桥。飞机刚落地，即获通知有敌机来袭，二十一中队来不及加油整備即再升空。这时，大队长高志航也刚乘民航机赶到笕桥，立即抢登一架尚未补充汽油的战机，冒着油料将罄的危险紧急升空，率众寻找敌踪，准备迎战。

日军笕桥空袭队第一分队长的一号机甫出云层，即被击中一弹，故未及投弹便偕二号机钻云右转。三号机虽投下炸弹，但仅炸中机场附近的油车。这时高志航也发现了三号机，乃与分队长谭文共同将之击落，残骸坠毁于钱塘江边金门槛附近。此时日机第三分队也飞临机场上空，虽曾投弹但并没有造成损害。

二十一中队长李桂丹率柳哲生及王文骅驾飞机升空，发现日机分队后立刻攻击。日方一号机被击中两发后逃逸，三号机则被李桂丹等三人合

力击落，残骸坠毁于乔司李家村附近。二号机再返航时又被高志航发现，在猛烈攻击后该机左翼中弹 14 发、右翼中弹 21 发、机身中弹 38 发，合计 73 发，造成左发动机熄火，但该机仍靠剩下的一具发动机勉强飞回台北松山机场，由于受损过重，日军放弃修复。在战斗中，高志航的战机被打坏了发动机中的一个汽缸，机身右侧也中了一弹，但仍安然降落笕桥机场。

二十二中队由于天气不良而偏航，在中队长黄光汉的指挥下降落广德加油，随后再升空飞笕桥。在雪堆里发现来袭的日本轰炸机，分队长乐以琴准备攻击，因那时飞机之间无法通话，便摇晃机翼向黄光汉请示，黄光汉以未奉上级命令，不敢下令行动，只好放弃机会。4 时 35 分，日本的广德空袭队飞到广德时，碰上了从笕桥升空疏散的周庭芳。然周庭芳因为是紧急升空，机枪子弹有限，只能穿梭于日机队中扰乱袭击。日机虽投下炸弹，因第二大队飞机已向上海出击而只炸毁空的棚厂。日机随后往杭州方向折返，其中一架第二分队第二号机，因油箱中弹最后燃料用尽，迫降在基隆港外，机身全毁，机员则安全逃出。

然我机升空时，二十一中队第二分队的刘署藩（或作刘树藩）、金安一驾驶的两架飞机，刚起飞即因发动机熄火而迫降。刘署藩机毁人受重伤，不治而亡。金安一受轻伤，飞机也只轻微受损。

总结这次笕桥上空黄昏时际的战果，我空军

四大队在空战中当场击落两架敌机，令两架敌机迫降、坠毁，我方无损失。日方总共损失四架，我方则只有“非战斗损失”一架，可谓“大胜”。

高志航如何赶到笕桥

八一四笕桥空战，我方之所以能“旗开得胜”，固然由于我空军健儿骁勇善战及日寇轻敌未派驱逐机护航，但关键则是大队长高志航亲下袭击敌机命令。上述二十二中队虽发现敌机，但队长黄光汉因未奉上级命令而不敢行动。即使高志航未到笕桥，二十一中队长李桂丹极可能也会下令出击，而大队长及时赶到，令士气大振，以致战果辉煌。

有的记载说：“大队长高志航由南昌乘空运机至笕桥。”有的记载却说：“大队长高志航也刚从长兴搭运输机赶到笕桥。”也有记载只说：“就在此时，一架多引擎的大型飞机居然在机场降落，机舱里跳下一个人之后，那飞机就马上掉头再度起飞。那人奔向飞行管理室而来，王荫华及曹世荣认出居然就是高志航大队长。”未说自何处而来。那么，高志航究是怎样从南京到南昌或到长兴，再赶到笕桥呢？

笔者先祖刘崇佑先生（1873-1941）于八一四笕桥空战之次年（即 1938 年 9 月 10 日）所撰《述亡弟崇佺之生平》所记，正是中航公司副驾驶、先叔祖刘崇佺先生（1899-1938）驾民航机载高志航从南京飞往笕桥。先祖在文中说：

去岁八一三沪战前一日，弟（按，指崇佺）由沪飞汉。八月十四晚乃回沪。余询何往，弟曰几不与兄相见，然大快意。盖弟十二日飞汉，十三日奉命飞南昌又回汉，十四日由汉飞沪。息宁（指南京）站时，空军某队长见之喜曰大好，速为我飞某地取件，敌机午后五时半当攻杭州，我已列机待之，但某件未齐，速往取。然其时正机师为美人某拒曰：我第三国人不能供役。某队长争之不得，势难下。弟前曰队长勿尔，回顾正机师曰：吾司机。某队长大喜曰我同行，速起航。弟曰此线吾未经，请以地图示我。曰今无之。曰然则奈何。是时长江暴风雨犹烈于上海，黑云漫天。某队长曰：时迫矣，将弗及。弟曰然则盲飞耳。遂易他机升空，旋转颠倒而去，中途对面不能辨，忽觉黑如墨者当前，姑略升其机，则山峰从机下奔过，卒以致短促之间，由某地取件达杭州。距敌机之来仅半小时。

使命既完，相互称庆。某队长曰：吾今即破敌，上海方空战，尔曷飞某处待我痛饮，已酬今日之劳。弟曰：吾能避，姑试之。遂回沪，则得某队长电告已破敌，落其四机……

先父滋业（1910-2004）于1990年赴上海探亲时，得以重阅此文。返台北后，回忆半个世纪前亲闻先叔祖之言：“某队长”即高志航，“某地”为广德机场，而“取件”是取机枪架。唯据何邦

立先生指出“某地”宜为四大队原来的训练基地南昌，才有取机枪架之可能。故先父之记忆可能部分有误，高志航是由先叔祖刘崇佺驾民航机自南京先到南昌，取得机枪架后再飞抵笕桥。也就是说，高志航之所以能及时赶到，率队破敌，造成八一四笕桥空战大捷，先叔祖乃关键人。若非他仗义冒险，凭借高超驾驶技术，驾机相送，高志航将无法及时赶到笕桥，八一四空战史或将改写。

先叔祖刘崇佺简传

刘崇佺，号全人，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人，1899年10月29日生。祖父刘齐衔为林文忠公则徐之长婿。亲兄弟中崇佑最长，崇佺最小，另一早殇。民前一年，父病故，因三哥崇杰（1881-1956）任驻日使馆参事，1913年崇佺13岁时随兄东渡求学。日本中学校毕业后，五哥崇伦（1885-1937）认为“日本非民治国家，子弟留学者宜改赴欧美以端其习，佺弟学费吾任筹措”。1920年崇佺遂由日赴美国，就读阿柏林中学。1922年夏毕业，同年秋入康奈尔大学，后转麻省理工，并在波士顿各地实习。1928年，他“感于各国竞习航空而我独无觉”，遂入纽约长岛飞行学校学习飞行技术，兼学制造发动机及机械画。

1931年与美籍女友结婚。1933年冬，学成回国。次年，入中央航校；因已具商业飞行资格，且由机械专业，乃在校教授航空机械，同时



1930年，刘崇侔和家人在福州的合影，后排左三起分别为刘崇侔、刘崇伟、刘崇佑、刘崇伦，中排左一为刘崇侔的美国妻子

接受高级组训练，专习轰炸机驾驶及投弹技术。1935年夏提前毕业，授予空军少尉军衔。惜当年底政府之新法令规定空军不得娶外国籍妻子，只得退役而长叹：“何以能入学而不能入军也！”长兄崇佑安慰他说：“少安，此法令由追溯而加限制之力，然非尔过，宜精尔术勿辍，他日国家有事当召尔矣。”之后，他进入中美合资之中国航空公司工作，但当时中国人受到歧视，只能担任副机师。

他在国内许多民航线都有丰富驾驶经验。1937年七七事变起，中航公司仍令他冒险往返上海与北平、天津之间，曾经多次遭受日本军机攻击，皆能运用其技术脱险。有一次曾向长兄崇佑说：“今晨津暴雨，敌机来迫。吾逆风高飞避之，而彼反被风而落。其技止此，吾空校之友皆远胜之，可庆也。”8月14日由汉口返上海，因风雨

暂停南京休息。正逢高志航觅机前往笕桥迎敌作战，而与美籍机师争执不下，刘崇侔乃说服美籍机师，由他驾机载高志航冒险辗转飞抵笕桥，然后返回上海。当高志航电告笕桥空战胜利时，他则长叹：“吾何日得杀敌哉！”后改飞汉口重庆线，据说曾数度为军方服务，但不悉其详。

1938年8月24日晨8时，中航公司“桂林号”客机由美籍机师伍兹（Hugh Leslie Woods）与刘崇侔驾驶，由香港飞往重庆，途经广东省中山县上空时，遭到日军5架驱逐机攻击而落入张家边（地名）水中。日本军机从高空低飞以机关枪密集扫射，来回20多次。落水后，机师伍兹不顾乘客，径自泅水逃逸。据受伤幸存者、中央银行职员楼兆念及无线电报务员罗昭明说，副机师刘崇侔在客舱抢救伤患时，被日机俯冲扫射，中弹殉职，享年39岁，杀敌壮志未酬，遗妻Adele及子女各一。其长兄刘崇佑在《述亡弟崇侔之生平》文中伤叹：

按楼君所述情形，则弟当时非无逃避机会。假若其时不匍匐入客座照料搭客，则此弹当不至适中之。假若亦如正机师之所为，不顾一切，先行离机，则或竟得生。然弟临难不苟，必尽其职，足以捐躯。呜呼，庶可为能完其人格矣。庶由已对我国家社会，而可告全受全归于吾父矣。……夫死亦何恨，余恨其抱杀敌之志愿，具杀敌之身手，而卒置诸无用之地，使之赤手为敌所杀，则可深痛也！

图说福州改革开放 40 年

林振寿



1981年成立并开工的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是全国电子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也是福州首家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的企业。



1982年，福州电信部门率先引进日本富士通F-150全数字时分万门程控交换设备，使福州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万门程控电话的城市。



改革开放，使福州这座古城英姿焕发，成为全国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1983年1月15日，福州至香港包机首次通航。



1983年，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带头呼吁松绑放权。一石激起千层浪，推动了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为以后的政企分开、企业改革和开放，为在全国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和高层次经营承包，为实行股份制等打下了基础。图为当年呼吁松绑放权的55位厂长、经理之一，时任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在车间检查产品质量。



1983年9月29日，福建省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在福州市建成通车。51路公交车作为福州市第一辆无轨电车，线路南起台江广场，北至火车站。



198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所私立女子大学——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在福州开办。其前身是创办于1908年的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该学院旨在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经营管理才干的妇女人才。图为应聘前来讲学的美国教师与学生练习英语对话。



1985年建成的福州江滨公园是福州市政府投巨资兴建的一处大型滨江园林景观，依闽江而建，分为南北两园，全长约10.5公里，是当时国内最长的都市江滨公园。



1986年9月6日，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和洪山乡居民首批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居民身份证。



1989年12月20日，福州台江农贸市场建成，面积4.2万平方米，为全国最大的农贸市场。



1991年11月下旬，福州啤酒厂、电线厂、第一酒厂、皮革公司等4家国有企业试行综合改革，标志着福州市企业改革逐步向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较高层次发展。是年，福州进入首批“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城市投资硬环境40优”的行列。



1992年4月20日，国家批准在福州长乐建设长乐国际机场。次年元旦动工兴建。1997年6月23日正式通航。



1995年11月23日，东南汽车公司在福州闽侯青口创立。



2001年1月2日，马祖客轮首次直航马尾；同年8月2日，马尾客轮首次直航马祖。“两马”航线正式开通。 刘述先 / 摄



2002年初竣工的新中亭街全长550米，宽270米，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是福州面积最大、配套齐全、功能完整、品味高雅，集旅游、观光、购物、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新型城市综合体。



2003年2月6日，福州马尾和海峡对岸的马祖首次共同举办“两马”闹元宵活动。



2005年10月1日，福州西湖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



2007年11月30日，平潭海峡大桥正式开工建设。



福州第一座城市天桥——东街口人行天桥曾经是福州的地标，2011年为给地铁让道被拆除。



2017年1月6日，福州地铁1号线一期全线（象峰—福州火车南站）开通运营。自此，福州进入地铁时代。

旧物新拾（二）

林 山

镇海楼古砖记

那年深秋，金风劲爽。友人相邀，参加福州淮安的一场乡间聚会。

记起曾在淮安“统督抚”三相公庙残墙上，看到砌在墙中的镇海楼古砖的侧面，现在不知境况如何，就专门拐过去看望。

庙正在修整，墙被糊抹着，看不到古砖了。视线扫过边上一堆残砖，觉得其中或许有什么。

居然，真找到几块残缺的镇海楼古砖。

镇海楼建于明洪武四年，也就是1371年。雄峙屏山山顶，飞檐翘角，气势凌空，是闽都榕城的重要地标。

镇海楼经历了600多年风雨沧桑。资料记载，从明洪武四年（1371）算起，到1970年最后一次拆毁，曾经九毁九建。据说，三次是遭雷击、两次失火、一次被大风吹倒、一次被人拆除。而九次为镇海楼大兴土木的大多数是官方倡建并与民间共同集资。



工程最大一次修葺是在光绪壬辰，就是光绪十八年（1892），陈宝琛挥毫题写碑文。1933年，光绪重建的镇海楼也失于大火，那年十九路军从上海撤到福建发动“福建事变”，在与蒋介石军队的对峙中，镇海楼旧址上建起了军事碉楼。抗战胜利之后闽籍议员倡议将碉楼改造为“林森纪念堂”。1946年由萨镇冰主持开工典礼开始建造，历时三年建成。1948年建成于镇海楼旧址上的林森纪念堂，于1970年被人拆除于动乱之中，理由是它容易成为军事攻击的目标，仅仅存世20余年。2006年11月镇海楼开始重建，2009年1月24日正式对外开放。

1993年6月29日，林利本先生在西门一个拆迁工地上，捡到了几块镇海楼古砖。这古砖，青灰色，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6厘米，重4公斤，砖面凹处凸文两排楷书“镇海楼、光绪壬辰造”。

后来，去淮安游玩，在三相公庙附近看到镇海楼古残砖。注意查看，又在庙墙上看到砖的侧面有字。拍照回来，放大了看，原来也是“镇海楼光绪壬辰造”。于是告诉了省文史馆卢馆长和省文物局郑局长。

就这几块古砖，对比、判断一下，应该都是光绪壬辰年（1892）大修镇海楼时的用砖。可能考虑到所用的地方不同，所以砖有的正面有字，侧面就没有字；侧面有字的，正面就没有字。算起来这古砖已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呀。

1933年镇海楼遭遇火灾，改建成军事碉堡。



刻有“镇海楼 光绪壬辰造”字样的古砖

许多被拆下来的古砖，就弃堆在山上。有人推测，当时有工人将这些古砖运回家，被砌到了西门民居的墙里。

可是在淮安的三相公庙看到镇海楼古砖，说明问题不这么简单。西门与屏山不远，搬运利用相对容易。淮安与屏山可就远了，还要过江的，为什么会搬到南台岛的西头这里呢？

近日，读《清朝野史大观》，看到《羊城四大丛林》记载：广州海幢寺“寺内所用之绿色砖瓦，均为平南王福晋舒氏所布施”。后来两藩营造府第，也打报告申请用琉璃瓦，部议不许。其实砖瓦都烧好了，不敢用，“尽施诸佛寺”。

恍然大悟。镇海楼是省会福州的一座特别重要的楼，在城市“三山”居中的屏山顶。官方作为“样楼”，民间称为“风水楼”，应该是“镇城之楼”。其构件砖瓦，寻常宅屋乃至官宦府第是消受不起的，只有佛寺庙宇能使用。因此想过去，那西门兜工地的古砖，应该原来也是某个佛寺庙宇的。

《清朝野史大观》说那些“寺内所用之绿色

砖瓦”，“近为古董家所易去殆尽矣”，可见，有价值的东西，总有它的归宿。

近年，参与镇海楼的一些活动，才知道，镇海楼里，还没有这么一块“光绪壬辰造”的古砖呢。

上下杭租折

周末在光明港地摊上看到一堆破纸碎片，有几个小本本。拿起来看，是过去的租户《缴租手折》。封面印着“最高指示”，哦，一定是“文革”期间使用的。注意一下，封面上填写的文字有意思：

“街办”一栏，应该是“街道办事处”的简称，写着“兴无”。“居委会”一栏，写着“灭资”。“房产坐落”一栏，写着“灭资85号”。“用户姓名”一栏，写着杨某某。

“文革”时候，我住在横街巷，也常去附近“兴无”“灭资”那里玩，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还在街上的“兴无商店”买过东西。如果没有经历过，想破头也想不到，“兴无”“灭资”就是“上杭”“下杭”。

上下杭，俗称“双杭”街，位于福州台江西南部。这片曾经以商业繁华而闻名的古老街区，是研究福州近代商业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如果说这是“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应该是有道理的。

台江临白龙江，“有台临江”，所以叫台江。

远在北宋元祐年间，南台大庙山以南就是闽江（白龙江）。《三山志》说这里“有江广三里，扬澜浩渺，涉者病之”。虽然过江不容易，但沿江岸有南北两个大沙痕，可供来往船只靠泊，装卸货物，成为天然的码头。

福州方言“痕”“航”同音，由北到南，分别就叫作“上航”“下航”，又可称“上杭”“下杭”。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羡慕人间天堂杭州的繁华，有意取这个“杭”字，还是仅仅因为谐音。

宋朝以后，大沙痕逐渐淤积硬化成陆地，成为街区，分别称上杭街、下杭街，合称“上下杭”或“双杭”。当时民谣：“龙船扒出后田口（帮洲后田），船工运货上下杭。”

清初，福州地区的自然寄泊港，逐渐由洪塘南移至台江北岸，也是由于上、下杭街这里水陆交通方便，就成为闽北土特产品的集散枢纽，商业街市逐渐发展。

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这里更加繁荣。上下杭商家比肩，行栈林立，多以批发为主，经营货物品种超过百种，商品辐射全国各地，远销东南亚各国。小小的区域，到处是银行、钱庄、商行、货栈、囤仓……涌现出名店铺和名行栈210多家，如黄恒盛布行、义美京果行、生顺茶栈、蔡大生鞭炮行、聚源发、建新隆纱布栈……

上下杭成为闽商的聚集地，有二三百年历史，是名闻海内外的“闽商”发祥地之一。涌现出了许多知名民族商业家，如张秋舫、罗金城、

罗勉侯、王梅惠、杨鸿斌、陈幼鸿、张桂荣、龚忠贞、蔡友兰等。作为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各国的商品集散地，知名侨商黄乃裳、杨鸿斌和港商柯伯诚、台商邱映光也兴业于此。

双杭地区起龙头作用，带动周边的义洲、帮洲、三保、万侯街（乃裳路）、潭尾街、苍霞洲、海防前（延平路）、大庙路等商贸发展，成为经营木材、茶叶、粮油、南北货、京果、食糖、土特产（香菇、笋干、土纸等）、海产干货、颜料、中药材、百货、棉布等的进出口商、批发商、代客商、溪行、货栈、船头行、九八行等林立的大宗批发业务集散地。福州的商帮会馆，有近半集中在上下杭这片不大的街区里。1905年，福州总商会在下杭街成立。

清末，洋货倾销福州市场，洋行、使馆、公馆大部分设在仓山，而洋行的触手也在上、下杭街一带挥舞，除倾销洋货外，廉价收购土特产品。到福州解放，双杭商贾贸易延续。1953年到1956年，双杭的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各行业公私合营，上、下杭一带也成为省、市部分商业公司及其所属商店批发站、货栈、仓库的集中地。

福州民间有句谚语“圣君殿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说的是台江三捷河（星安河）两头均连通闽江。涨潮时，闽江潮水南端从新桥仔流入达道河至三捷河，西端由帮洲后田流入三捷河，两河汇聚于三通桥北侧张真君祖殿前，形成独特的会潮景观，迎合了商人“财源茂盛达三



江”的吉利口彩。而在城内，东南边和西南边来的内河潮水，在双抛桥下汇合，所以原名合潮桥，老百姓叫会潮桥。明《闽都记》：“二潮吞吐，缭绕若带，会城一奇也。”那时，台江还是城外。

当时一些商帮人士借用张真君祖殿议事，上下杭成了各商帮的活动中心。19世纪40年代，人们在祖殿里设立“福州钱业商事研究所”，各商帮、各行业都在这里议行论市、互通商业情报。自然而然，就把张真君敬若商神。

“文革”中，双杭街道被改名“兴无”街道，上杭居委会改名“灭资”居委会，下杭居委会改名“兴无居委会”。之后，才又改回原来的名称。

淘到富有时代和地域特征的这几本租折，非常开心。更神奇的是，后来在左海公园西门的地摊，居然又淘到同一用户的《缴租手折》，凑起来，有5本。一对比，有意思。只要有语录的，就是“兴无”“灭资”，没有语录的，就是“双杭”“上杭”。

人杰地灵话螺洲

楚 欣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陋室铭》）推而论之，地方不在大，有杰出人士与美丽风光则当刮目相看。

螺洲，就是这样一个古镇。

洲者，因江河长期冲刷淤积而成的陆地。螺洲，乃闽江千百年来活动的“产物”，它位于南台岛的东南端，毗邻城门镇、盖山镇，古称“百花仙洲”，是自然与文化共同孕育的一颗璀璨明珠。

为什么称“螺洲”？当地有两种说法。

一说，因为洲形像田螺。《螺洲志·小序》云：“螺洲之名何自昉乎，或谓川光镜静，而洲澹拖，隐约状如青螺，故名。”宋代梁克家所撰的《三山志》也有类似的记述。

另说，因为有过一位不平凡的女性——田螺姑娘。这个故事相当久远，要追溯到一千六七百年前的晋代。西晋束皙的《发蒙记》、东晋干宝的《搜神记》、陶渊明的《搜神后记》，都有记

述。大意是，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因家穷，十七八岁时尚未娶妻。有一天，他在耕耘过程中捡到一粒大田螺，即拿回家放在瓮中喂养。想不到的是，以后每天他出门劳作，回来时总能看到家中的饭菜已经做好。起先以为是好心的邻居帮忙。一问，没有。谢端觉得奇怪，便暗中窥探，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水缸里那粒田螺变幻的女子（田螺姑娘）所为。此女乃天上神仙，自称“白水素女”，受天帝委派下凡替谢端“守舍炊烹”。由于已经显形被认出，只得离开人间返回天上。谢端送走田螺姑娘后，立下神座祭祀。后来，当地老百姓则将谢端所居住的地方称作“螺洲”，明代闽中才子王偁还为螺女庙题写了“螺仙胜迹”的石碑。

两种说法，都有文字依据，但螺洲人对田螺姑娘的故事更为兴趣。尽管这个故事只是传说，不能当真，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螺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晋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

息。宋时，螺洲的文化较为发达，已有人进入仕途。清末，螺洲更是农渔丰饶、工商茂盛、交通方便、文教繁荣之地，素有“小福州”之称。

螺洲的自然风光绝佳，特色之一在于近水远山。即洲南面是烟波浩渺的螺江（乌龙江），水之外有许多山峰环拱，最著名的当数隔江相望的五虎山。此外，北有鼓山，东西有石布山、高盖山、方岐山、凤山等等。山水分布若近若远，周边接壤舒展有余。正如《螺江小序》所言：“有山水之乐，无山水之逼者，此也。”由于风光秀美，赞赏的诗文自然不少。明代风靡一时的《螺江八咏》堪称代表作，其中《远屿堆蓝》写道：“夜雨洗远山，新晴净于拭。倒影入中流，蔚蓝同一色。”《野渡舟横》写道：“一叶横江浒，停桡待问津。风平潮未上，闲杀济川人。”

螺洲的归属，历史上时有变化。唐、宋、元、明时，分属闽县安仁乡仁惠里与温泉乡永福里，清代属闽县白湖区，民国期间属闽侯县白湖区螺螯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闽侯县一区，继而属城门乡。1970年划归福州朝阳区（今

仓山区）。1975年改属福州郊区。1984年正式成立螺洲镇。1996年起，属仓山区。面积6.4平方公里，下辖店前、吴厝、洲尾、杜园、天福、乾元、鳌山7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有3万多人。值得一提的是，1950—1970年，螺洲曾先后是闽侯县政府、闽侯行政专员公署的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造的那两座带有“苏式”风格的办公楼，如今已被视为文物，得到小心呵护。

螺洲物产丰富，是福州平原上著名的鱼米之乡。过去，这里以农业为主，经济作物多种多样，其中福橘最为出名。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闽江橘子红》中的许多外景，就是在螺洲拍摄的。改革开放以来，螺洲大力发展瓜果、奶牛、家禽家畜等多种经营，成为福州的副食品和蔬菜供应基地。

螺洲的城镇建设，日新月异。螺洲大桥、环岛路（螺洲段）、滨江休闲道、南台大道两侧绿化带，螺洲河（锦绣水乡段）整治等项目，都在近年完成。“历史风貌保护区和温泉小镇”的恢宏规划，正在有条不紊地实现。



螺洲可介绍的方面还有不少，但最值得一说的是这里的人。

据有关族谱记载，螺洲的居民主要为店前村的陈姓、吴厝村的吴姓、洲尾村的林姓。宋代，他们就已在这里定居。漫长的岁月里，三姓人当中，有不少奋发图强者，为家乡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陈姓，仅明清两代，就出了21位进士，108位举人。这在福建乃至全国，实属罕见。其中，陈承裘父子四进士，陈宝琛兄弟六科甲，更是占尽风流。至于陈若霖的“斩皇子”，虽然只是戏台上的事，但这位刑部尚书刚正不阿、秉公办事则是无可置疑。当然，最为现代人熟悉的还是“帝师”陈宝琛。此公先后在清廷一些部门任职，1883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敢向慈禧太后进谏而闻名。后被罢官，回归故里。其间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出任鳌峰书院山长（书院后改名全闽大学堂，接着改称福建高等学堂，即今福建师大前身）。1909年，三岁的溥仪登基，即为宣统皇帝，陈宝琛被召回。辛亥革命后，清朝虽然被推翻，但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可住在故宫。陈宝琛则成为皇帝身边的老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溥仪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成立伪满洲国。对此，陈宝琛不以为然，坚决反对。尽管溥仪骂他“迂腐不堪”，“帝师”仍不为所动。这是陈氏后人最值得欣慰的事。陈宝琛晚节可嘉，他的政治品德值得称赞。

近现代中国，从螺洲走出去的陈姓人才，

更是不可胜数。诸如，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夫人陈意映，海军前辈、轮机专家陈兆锵，经济学泰斗、北大教授陈岱孙，中科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陈彪，等等。

关于吴姓，明清以来，也出了6名进士，19名举人。明代的吴复（1389—1470），曾任工部侍郎，是一位清官能吏。他在吴县任职时，曾妥善处置“百僧同狱”案，避免了一场“刀火”之灾而大获赞誉。他还曾负责黄河的治理，得到肯定。但最让螺洲吴姓人引以为豪的是中共隐蔽战线的英雄吴石。

吴石（1894—1950），原名萃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投身福建北伐军。1914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相继参加征闽靖国军、闽南民军、冯玉祥的国民军。1929年，东渡日本攻读军事，学成回国，被聘为中国陆军大学教官。全面抗战时，出任参谋部二组（厅）第一处处长，负责情报工作，一直主张国共合作。1940年，因在桂南会战中立功，被任命为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还曾任军政部办公室中将主任。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极为痛心，他渴望中国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因而不断与中共有关负责人接触。解放战争期间，接受中共和“民联”的指示，收集、传递军事核心秘密。1949年初，曾协助我地下党，策动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同年6月前往香港，向中共华南分局提供有关国民党的绝密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吴石接受组织指示，以国民党

“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赴台执行秘密任务，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虽然身处险境，情报工作却取得很大成效。不幸的是，1950年初，因叛徒出卖被捕，壮烈牺牲。

关于林姓。宋庆元年间，林文茂，官至惠州别驾，朝议大夫。清代，乾隆戊子科举人林雨化，曾先后在惠安、南平、宁德的县学任教谕。嘉庆辛酉科进士林瑞春，曾任内阁中书、汉票签行走、帮办汉木堂事务、乡试同考官、国史馆分校等职，因丁忧辞官回乡，被聘为龙光书院山长，后又主讲越山书院，著有《中庸》《仪礼》以及古诗词若干卷。螺洲林姓还出了不少文人学者。最突出的当数明永乐年间“闽中才子”——林垕、林峦及其侄林桷。此三人才华横溢，却不恋功名，一生寄情山水，深居简出。他们曾写下反映螺洲四季风光的诗作《螺江八咏》，为世人所称赞。

此外，近现代诗人、民主革命者林庚白（1897—1941）也值得介绍。此君自号“愚公”。在天津北洋客籍学堂读书时，曾参加反日学生运动，被推为总代表。辛亥革命爆发，与人创设“京津同盟会”。1912年，加入柳亚子创办与主持的南社。1917年，任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秘书。抗日战争期间，写下大量的爱国诗文。针对文坛上声名显赫并同为福建闽侯籍的郑孝胥，他

直率地写道：“十年前论今人诗，郑孝胥第一，余居第二；顷则尚论古今人，余居第一……孝胥卑不足道矣。”的确，郑孝胥的诗原先写得不错，但他后来投靠日本，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人格卑下，怎么能跟堂堂的爱国者相提并论呢？林庚白对他的鄙视理直气壮，充满自豪。

螺洲历史悠久，名人众多，留下的胜迹自然不少。最显赫的是陈氏宗祠、吴氏宗祠堂、林氏宗祠，它们均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这些祠堂建筑恢宏，布局严谨，有很高的文化内涵。陈氏宗祠门楼的横额是左宗棠所写，两旁的楹联“冠带今螺渚，诗书古颍川”，出自李鸿章之手。一座家庙能有如此显赫的高官名人为之题字，足见其身份不同寻常。同样，吴氏宗祠祖厅上的“文武名宗”匾，乃清代顺治皇帝御



螺江陈氏宗祠

赐，也很珍贵。至于林氏宗祠大门两旁的楹联“双流汇渚为襟带，群峭当门似画图”，则为陈宝琛所书，它充分说明，螺洲人虽然有姓氏之分，但彼此间非常亲近。此外，陈若霖故居、陈宝琛故居（“陈氏五楼”）以及天后宫、临水宫、华严精舍、灵山寺、狱宗泰山府、南极天君主宰堂等等，也都各具特色。然而，给来访者印象更深刻的是那些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建筑，诸如孔庙、奎光阁、观澜书院。

孔庙，又称文庙，俗称至圣庙、圣人殿，始建于南宋宝庆年间（1255）。孔庙并非一般庙宇，不是想建就能建。按现在的话说，它属于“官办”，有严格的规定，即“京都至郡县州府，方可建孔庙，民间地方不得私建，违者以违制论处”。螺洲当时是个不大的村落，按说资格不够，然而当地人却堂而皇之地建了孔庙。尽管

这个行为表现出重文兴教的精神，但毕竟违反规定，于是官府勒令拆除。消息传来，一时人心惶惶。据传此时有个书生挺身而出，主动到衙门分辩。他义正词严地说道：“乡人违制兴建文庙，确为不敬，应向先师、官府请罪。然自古只闻建文庙者，而未见拆文庙者。请问，兴而复，拆者该当何罪？”此番话有理有据，说得官府的老爷们哑口无言，只得收回成命。螺洲孔庙作为“另类”能够保存至今，的确不容易。它堪称福建乃至全国“行政级别”最低的孔庙。不过，“级别”虽低，建筑的规制仍齐全，有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集贤堂等，雕梁画栋，气势非凡。据说它的规模与档次，仅逊于省城福州的那座孔庙，相当难得。

奎光阁，也称文昌宫、文昌阁、帝君庙。

“奎”，即奎星——北斗的第一星，道家称之为天

罡星。“奎”主文章，是决定科举文运的星辰。到了宋代，“奎”演化为文官的第一位。山东曲阜孔庙中轴线上，第一座建筑就是奎文阁。螺洲的奎光阁位于陈氏宗祠的一侧，始建于明代中叶，曾是古螺洲的四大书斋之一。坐北朝南，单间二进布局。前厅为“晚乐轩”，读书之处。后厅两侧为双轩



螺洲孔庙



奎光阁

廊，尽头是钟鼓廊亭。天井里栽植两棵桂花树，寓意陈氏子弟蟾门折桂。阁内的柱梁、驼峰、斗拱、悬钟、藻井，都具有明清建筑的特征，尤其是高深的围墙，呈现一种威严的神秘感。大门上方的横匾“奎光阁”三字，雄浑有力，为明代著名书法家张瑞图（晋江人）所题。奎光阁内的所有木刻、石刻图案，都与科举文运有关，连台阶也不例外，全是三级。意思是，秀才、举人、进士，拾级而上，步步高升。据说奎光阁内原来还有一座马的雕塑，称“千里驹”。村人陈芳楷

（陈氏十世祖）赴京考试，奎星派千里驹护送，及第后，此马日行千里回乡报喜。后人为了感念千里驹，就在奎光阁内为它塑像。

观澜书院，原为文昌宫，坐落于洲尾村螺江畔。始建于明代，后改建成“读书楼”，复称“观澜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创办新学。观澜书院顺应时代潮流，第二年（1906）即改为观澜小学（现名洲尾小学）。这座古建筑之前有一大埕，右前方榕树旁为螺女庙（目前仅存的一处）。再往前，乃烟波浩荡的乌龙江。

“观澜”之称，可谓名副其实。正如前辈乡贤林观涛所作的诗所云：“远山三面浸江波，古木千章挂碧萝。想见当年兄弟侄，读书声和雨声多。”从观澜书院走出去的名人很多。明代，有林岳、林峦及其侄林赓三人。清代乾隆年间，有林希吾（化雨）。此人生性耿直，敢于抗争，与林则徐之父林宾日等组织“真率会”，受到林则徐的高度称赞。此外，还有林筠、林芳霭、林光谱等等。改为观澜小学后，也办得相当不错，陈宝琛回乡时，曾书赠一副对联称赞：“劝课农桑诚有道，放怀鱼岛欲忘形。”1927年，海军名宿陈绍宽曾担任观澜小学名誉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观澜小学还曾是中共地下党秘密活动据点，许多学生投身革命。

古代，螺洲出过不少名人。近现代，名人更多，其中包括福州三坊七巷的一些名人，也来自这里。可以说，没有螺洲的不断“输送”，声名显赫的三坊七巷将有所减色。

末代帝师陈宝琛家族的五代传奇

郑 芳

1908 年的一个冬夜，清宫卫队长敲开了醇亲王府的大门，按慈禧太后旨意把 3 岁的溥仪接进宫中教养，准备接位。

在香烟缭绕的坤宁宫内，即将咽气的慈禧接见了溥仪，告诉他要即日登基。在太和殿上隆重举行登基大典时，溥仪在大臣陈宝琛身上发现了一个装着蝓蝓的小笼子。他对蝓蝓的兴趣显然要超过几千名跪在他脚下的文武大臣。

这是电影《末代皇帝》中的一幕，因为这一幕，人们将一个叫陈宝琛的清朝官宦与末代帝师的身份联系起来。

实际上，这并不是这位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直至民国的老人，唯一的身份。

在福州南台岛畔的螺洲镇，陈宝琛这个名字有着更多的意义：清道光年间刑部尚书陈若霖的曾孙、“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的领头人陈承裘的儿子、“湾区中文电视之父”陈立欧的父亲、革命志士陈矩孙的祖父……这些相关联的名字，组成了这个临江小镇上最有名望的家族——

“陈宝琛家族”。仅从明朝至清末，这个陈氏家族就出了 21 位进士、108 名举人。

第一次寻访“螺洲陈氏”是在 14 年前。2004 年 6 月 13 日，在螺洲镇卫生所，所长陈天培和他的妻子向我们絮叨，“五楼塌了，不应该让它塌……”陈天培是镇上螺洲陈氏宗祠的理事，和陈宝琛同族，是螺洲陈氏第 20 世。他持续了 20 多年整理撰写关于这个家族的文章，并且收藏着唯一一套 20 世纪 30 年代用活字排版印刷的螺



陈天培收藏的陈氏家谱

洲镇陈氏族谱。

陈天培所说的五楼是陈氏五楼，螺洲陈氏至14世陈若霖开始修建居住的府邸，也是陈宝琛故居。

2004年，因为年久失修，这座昔日的园林宅院部分坍塌，院子里满是碎石和垃圾，但透过大院高墙、回廊曲径、长满青苔的小池塘、二楼过道上残留的木制美人靠，一个世代簪缨家族曾有过的荣光，还依稀可见。

之后不久，在2005年和2008年，政府分两期对陈氏五楼这座福州著名的古典园林建筑和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做了修复。如今，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和晞楼已全部修缮重现，虽然不少结构细节未能还原，但整组建筑的风貌仍在。这座占地4000多平方米，集南方私家园林和北方庭园风格于一体的建筑，墙外是小镇嘈杂的

居住区，围墙内是另一景象，鸟语花香，气定神闲。

“斩皇子”的陈若霖

修复前，在荒废的陈氏五楼建筑群中，有一栋楼已经完全坍塌，废墟上横竖着一些折断的残木和砖块，残垣断壁上长出些青苔和野草。这座被叫作“赐书轩”的楼，是陈氏五楼中修建最早的，曾经记载着陈氏家族由平凡转向富贵的历史。

“赐书轩”的始建者是陈若霖，清道光年间的刑部尚书。这个唐朝末年随王潮、王审知兄弟从固始迁入福建的家族，从第13代孙开始，逐渐显贵。

嘉庆十三年(1808)，陈若霖因为“资深超”，提为四川盐茶道。以后，任官按察使、布



摄于2016年3月，修缮后的陈宝琛故居，位于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店前村



摄于2004年6月，“赐书轩”是当时陈氏五楼中唯一住人的屋子



摄于2004年的陈氏五楼

用这样的方式纪念陈若霖，是希望在风雨飘摇的黑暗时刻，找到心灵的支撑。

辞官孝子陈承裘

陈承裘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出名，往上比不了他爷爷陈若霖、爸爸陈景亮，向下比不上他儿子陈宝琛。陈承裘虽也是进士出身，但做官只到刑部主事，而且早早就回家养亲，但在螺洲陈氏的族谱中，他却是最出名的

孝子。

1852年，陈承裘赴京会试，中了进士，以刑部主事用，在浙江司行走。所谓“行走”，指入值办事，是清朝创制的一种官职称呼，凡调充某项职务即称在某处或某官上“行走”。陈承裘中进士后被派为刑部主事，这已为他的仕途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时，离尚书陈若霖去世还不到20年，京都公卿都是陈若霖的旧同事，随便托个关系，仕途“进取”乃至飞黄腾达都不是难事，而且，在那个买官盛行的时代，这也并不是什么丑事。可他不这么做，而是假借回家伺候亲老的名义辞官，终身不复出山。

在那个时代，做官难，不做官也难。这个不喜欢名利场上明争暗斗的官员只能找伺候亲老作借口，达到辞官目的。实际上，伺候亲老并不只是借口。陈承裘的孝顺，在这个小镇上流传已久。

政使、巡抚总督。道光四年（1824），入为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事，旋转刑部。道光皇帝曾屡赐御书给陈若霖。陈感恩涕零，便在家乡的府第内建起一座“赐书轩”，收藏“御书”，以报皇恩。

这个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虽然颇得朝廷赏识，但却有些个性，并不愚忠。

200年时间过去，镇上的人说到这个清朝官宦，总会提起一出闽剧：清朝皇子洪杵见宰相之女李雪娇有羞花闭月之美、沉鱼落雁之貌，便假传太后“懿旨”，将其骗进宫中，欲行非礼。雪娇不从，自缢身亡。刑部大臣陈若霖不畏权势，屡经曲折，判清冤案，斩了皇子。

不过，这出1945年首演的闽剧《陈若霖斩皇子》并非史实，戏里的陈若霖是许多民间传说虚构的形象。螺洲镇上、福州城里的百姓们，将这个清廉刚正的清朝刑部尚书比作了神灵，他们



1931年底，溥仪在日本策划下潜赴东北，建立傀儡政权，陈宝琛拒任伪职，后于1935年卒于北京



陈宝琛与晚清遗老合影于天津



陈宝琛与他的四个女儿，后排左起分别为京贞、南贞、勤贞、容贞

据说，为了服侍积劳成疾的母亲郑夫人，他夜不解带，随侍在侧，达两年之久。在医生束手无策时，为了治好母亲的病，这个中年男子竟尝试各种自戕的方式。先按术士指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诵读《北斗经》一个多月。发觉没有效果后，又效法孝经所推崇的孝子典型，先割臂为药引，无效，再割右股肉为药引，而且还要“裹血强起无怠容”，以此瞒住母亲。

帝师陈宝琛

陈承裘的最大功劳应该是生了七个儿子（一子早年夭折），而且六个儿子都登科第。

陈承裘在父亲陈景亮病休后也跟着弃官回家，在家专心督课子弟，济贫乡里。也许，如果陈承裘一路仕进，就没有后来“六子科甲”这回

事儿了。

这六个儿子，宝琛、宝缙、宝璐中进士，宝琦、宝瑄、宝璜中举人。更奇的是，宝缙、宝璐再加上宝璜的儿子陈懋鼎，三人同一年中进士，被称为“父子叔侄兄弟同榜进士”。声名之隆，文运之盛，一时无两。可惜的是，陈承裘只看到了长子陈宝琛的官场得意。

陈宝琛在官场上最受恩宠的时期应从巡抚改授帝师时算起。

宣统三年（1911）5月，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入学，陈宝琛被招进宫给这小皇帝做师傅。在几位汉文师傅中，溥仪对陈宝琛最有好感。这个身材矮小、略显富态、精神矍铄、面貌慈祥的长者，在英国人庄士敦到来之前，在溥仪心中简直就是一尊完美的偶像。溥仪最喜欢看到的是这个陈师傅笑得开心时，眼睛在老花镜片后眯成一条

缝，一只手慢慢地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时的神态。

陈师傅学识渊博，带着福州乡音的官话也并不难听懂。他阐发经义透辟入里，但溥仪更喜欢听的是他的闲谈。差不多每天早晨，陈宝琛都向他传播一些民国的新闻，比如南北不和、督军火并、府院交恶等，大致都是些令遗老们高兴的民国丑闻。

陈宝琛对溥仪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注意诱导匡正，就像一名称职的导演。觐见溥仪的人，常常称赞“皇上天稟聪明”，其实很多都是陈宝琛教的。

在溥仪的那本《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一句：“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湾区中文电视之父”陈立鸥

1919年11月9日，70多岁高龄的陈宝琛晚年得子——陈懋随（立鸥）。当时，正值张勋复辟失败，陈宝琛的心情相当低落，而这个上天不经意赐给他的男孩是否给深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的陈宝琛些许的安慰，已无法探知。不过，成长后的陈立鸥应该是值得陈宝琛骄傲的。

“我对陈宝琛他们家还是比较熟悉的，陈宝琛一共有六个儿子，最小一个儿子叫陈立鸥，很厉害，是美国旧金山大学的教授，还在美国旧金山创办了一个中文电视台。他曾经回过福州，拿



陈宝琛与儿孙合影，后排左起为懋需、懋侗、懋复、懋艮，前排左为孙子陈繁，右为陈懋随（立鸥）

出10万美元给福建师大创立了一个陈宝琛教育基金。可惜前几年遇上车祸，去世了。”曾任林觉民故居馆长的李厚威先生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陈立鸥，早年留学美国，之后当过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后来在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任中国语文和日本语文系主任。

1974年，陈立鸥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美亚电视传播公司，成立海外第一家中文电视台——“美亚电视”，传播中华文化。20多年来，历经艰辛，起起落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被中文新闻媒介誉为“湾区中文电视之父”。

能在一个以英文为主的国家办起了中文电视台并拥有自己的发射台，全天24小时播出近三分之二的中国节目，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地下党员陈矩孙

在螺洲陈氏这个世代为官的封建家庭，尽管显赫一时的陈宝琛继续奉行陈家祖训上“忠君”的原则，但在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陈家的晚辈们开始以不同于先祖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社会理想。

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陈宝琛的孙子陈矩孙。

1933年，20岁的陈矩孙考入北京燕京大学。这个中学时就开始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青年，关于北京的理想很简单——好好读几年书，同时做个业余革命者。只是，当时的局势不可能让这种理想实现。

中国社会，日寇侵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学校里，进步的和反动的力量在激烈地争夺青年。参与斗争成了义不容辞的事，陈矩孙开始和进步同学一起做学生会的工作。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布“天羽声明”，露骨地向全世界宣布侵略中国的决策。那个晚上，这个年轻人哭了整晚。从那时开始，他全身心投入革命。

“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学联讨论工作分工，指定由陈矩孙起草震撼人心的宣言。这一时期，陈矩孙先后担任地下党的燕大支部书记、北平西区区委书记等职。1940年初，他从延安返回日寇占领下的北平，以燕大研究生为名开展活

动。那时，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秘书、“陈太傅孙子”的身份，成为他在敌人眼皮下拉关系、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掩护。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当夜包围燕京大学，入校捕人，想抓的第一人就是陈矩孙。幸好，这一夜他住在城里祖父故居，通过认识祖父的日本驻北平总领事，拿到一张通行证，逃脱敌人的搜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矩孙长期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文革”中，被下放到浦城山区。1983年12月，有关部门决定，其党龄从1946年1月和闽浙赣省委接上关系之时算起。

1987年4月，陈矩孙病逝。

以上仅仅是这个螺洲最有名望的陈氏家族史中的几个人物、几个片段，正如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的陈家后人陈绛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提到的，“螺洲陈氏族人在近现代还有很多著名人物，我无法一一缕述。譬如：海军首任轮机中将陈兆锵，抗日名将、解放战争中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国民党海军中将陈庆甲，公路工程专家、南京国民政府福建省建设厅厅长陈体诚，中国科学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陈彪，金属物理学家陈簏，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陈伟，等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就义前写给妻子感人的诀别书，他的妻子陈意映也是螺洲陈家族亲”。螺洲陈氏的故事，也许十本书也无法讲完。

直 笔 人 间

——记史界才女陈懋恒

陈 三

1930年的一天，燕京大学选课大楼正中公告板上，一封昨日被同学侧目的英文公开信旁，赫然贴了桃子般大小字号的中文“回帖”《答谭君海英》——帖中质问谭海英写英文信的用意。并且质问，为了援助女同学而牺牲自己的学生会主席要不要支持？为什么迫害了学生还要同学们理解与支持？英文信的作者谭某是中国人，用英文写，是不是为给主子看？“若欲抹杀公理，媚兹一人，女生天良具在，不敢阿附……”言辞犀利，遐迩震惊。

落款是斗大的汉字：陈懋恒。

已故前福建文史馆馆员张龢生前曾为陈懋恒写下一首挽诗，前四句是这样的：“冰心旧作传都下，庐阮新诗动大江。何若懋恒留直笔，史

书早已著东邦……”而北大毕业的、原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卢美松也声称：“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改变（或曰造就）一个人的志趣和命运的话，那么，就是《中国上古史演义》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部前后重印9次、印数30多万册计的著作，曾经引导了少年时代的卢美松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历史的兴趣。它的作者是陈懋恒。如胡



《中国上古史演义》 陈懋恒 / 著

适先生盛赞林徽因为“一代才女”，历史大师顾颉刚先生也盛称陈懋恒为“中国一代才女”。

陈懋恒（1901-1968），字穉常，号荔子、墨痕等，衣锦坊陈承裘后人，宣统帝师陈宝琛二弟陈宝璫的女儿。她的母亲原是陈宝璫原配曾夫人的陪嫁丫头，后被纳为继室。她是家中老小，父亲高龄得女，自然在家中得到娇宠。

虽然陈懋恒的伯母王眉寿与伯父陈宝琛曾于1905、1906年创办了最早的乌石山女塾、女子传习所等女子教育学校，但陈宝璫家却是十分保守，只许女儿在家中上私塾。因故家囿习及父兄深厚的古学功底，陈懋恒自幼在家习经史，并学习琴棋书画，6岁始学作诗。能背诵《十三经》中的十一经，谙古典籍，工诗词骈散文，是典型的旧式才女。一家大小都视她“腹笥通”（知识融通）。

封建社会，中规中矩的教育、婚姻模式让陈懋恒从小就目睹成长于此中的部分女性的悲凉人生。一位姐姐像《红

楼梦》中迎春一样，遵父母之命嫁给一个官僚。由于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丈夫老在外吃花酒、赌博、上妓院，姐姐心情郁闷，痛苦不堪，不几年就患病去世。她知道自己的命运也逃脱不了这种格局：那就是识得一些字，长大后嫁与官僚后裔。因此，陈懋恒决心离开家庭，走独立自主之路。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大学。

于是她借助邮寄函授，自学理化、外文诸科。24岁才得以入华南女子学院附中就读。她恳求兄长为她买了一堆英语书偷偷自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做到了会懂会写会翻译，只是发音不准。1928年，她才进入燕大，而此时，冰心从燕大赴美获硕士学位回燕大教书已两年了；比她大4岁的王世静已当上华南女子学院院长。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旧址

二

1927年，陈懋恒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毕业，升入学院深造。1928年转学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插班就读。

1930年夏，因学生张琼夏不愿加入“团契”——燕大的教会组织，放暑假时，校女部主任费宾闰臣便伪造医生证明，涂改考分，强制将张琼夏送去车站，令她离校回家。张琼夏的室友马仰曹（马寅初之女）见她受凌辱欺压太甚，遂同她回校，把事实告诉学生会，请求援助。学生会主席赵泉澄力持公正，因而受牵连，反被无理开除。一时校内舆论大哗，不可遏止。校务长司



1931年就读燕京大学时的陈懋恒

徒雷登亦由美国匆匆返校向受辱同学表示歉意以斡旋此事。新开学时，燕大女生谭海英用英文颂扬费氏政绩，写了致同学的公函，张贴于选课大楼正中公告板上。函上说，不能因为费氏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而不原谅她。这封号召同学拥护费氏的英文公开信，博得不少美国主子的赞赏。可是到第二天，便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

对于陈懋恒的侠义之举，同班同学马仰曹在1931年春天记道：陈氏在闽为望族，然懋恒之思想颇不受地域与环境所束缚。其形貌虽娇弱，而行事则类丈夫。性豪爽而果敢、诚笃而正直，平生最恶阿谀逢迎之人，嫉之如仇。惜锋芒太露，畏忌者半，此殆其所短欤。

燕京大学这次学潮持续了三年。斗争的结果是，校方无奈，费氏服罪，张琼夏返校复学，赵泉澄恢复了学籍。这个结局是学生运动的产物，此中陈懋恒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这场运动中，陈懋恒结识了学生会主席、主持正义的政治系的赵泉澄。1931年，他们同入燕大研究院，成为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弟子。赵泉澄（1900-1979），一位杭州底层农民的儿子。因有着共同的信仰与道路，二人执手，于1935年在京以茶话会形式举行婚礼。婚礼上，司徒雷登不请自来，上门致贺。

婚后，夫妇卜居于北京图书馆侧，并整理清室档案。二人从此相濡以沫，共同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

三

陈懋恒的成名作是1930年完成的《明代倭寇考略》，初刊于1933年哈佛燕京学社的《燕京学报》。书中她引用了18种史书，30多种地方志，被称作“最具典范的研究成果的经典著作”。她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代理《京报》主笔。同年在燕大研究院获硕士学位。

这两位书生婚后的生活几乎沉浸在书堆里，并且感到是“最快乐”的时期：一个月工资到手，便匆匆跑到琉璃厂或隆福寺的书摊，徘徊瞻眺，细意摩挲。倘若有时花区区代价买了一两本残篇缺叶，便如获至宝，互相夸耀各自的战利品。假如一方发现某处一书摊或地摊，便相互通知一起拜访，把所有休息时间都消磨其中，自得其乐。时间与经济都有限，所以面对索价太高的“好东西”时，只得割爱。有一次，赵泉澄在西四附近发现一大批清末档案，乐不可支，晚上回家，全身上下布满灰尘，洗过好几盆水之后，连开水也没喝就赶忙与陈懋恒分享当天的成果并打算次日再去。陈懋恒受不住“诱惑”，次日一早与他同往。找到那个曲里拐弯的路里的一个所在，里面堆满了破旧簿册，像煤厂的煤堆一样。弯腰捡了几本看，居然发现罕见的史料，二人不免再次流连……还有一次，赵泉澄领了工资去商务馆“巡礼”，把工资全花光了。回家不免被陈懋恒抱怨几句。他也不回嘴。第二天一早很神秘地

告诉懋恒，“商务书真不错，你下课后可以去看看。”不想陈懋恒去了以后，花得连回家的车费也不够，只得抱书徒步而回。回到家，二人对视大笑……

每夜灯下，二人对案，整理缀积《清代地理沿革表》等书的初稿。偶有创获，互为质正。

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生活就会这么平静地过下去。但是很快战争的烽烟燃起，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北平右街成了敌兵的巢窟。

夫妻二人奔波生计，两岁的大儿子赵之华因无人看管，由暖室爬至雪地，患上哮喘病。这是1938年正月的一天。不久，警察又吆喝着打门通知：不妥书籍，趁早自动焚毁……于是在院子中，多年心血淘来的书籍无奈葬身火蛇腹中。不止于此，因为住在北房的房客不在，而且他的刊物都是抗日的，成捆堆在屋中。为了让院中其他人避免干系，他们只好替他烧、撕、扯，挑拨火堆至半夜，已怀孕了6个多月的陈懋恒突觉得腰痛得站不起来，一阵头昏袭来，几乎晕厥，但她顾不得这些，还得按着痛如刀刺的腰，继续焚烧直到天色发亮。次日，扶病至东城大哥陈懋鼎家中，却早产了，孩子很快夭折。

女儿夭折之后，为躲避战火，陈懋恒举家南迁到上海，她进入了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无锡国专及圣约翰大学、上海美专等校任教或兼课。同时为1940年去世的大哥陈懋鼎续译《岛雄记》（即《基度山伯爵》）。此外，她为大哥整理了《槐楼诗钞》，却屡受到时任商务书馆经理的十一哥阻

挠，未曾出版，后来十一哥却以整理者署名，偷偷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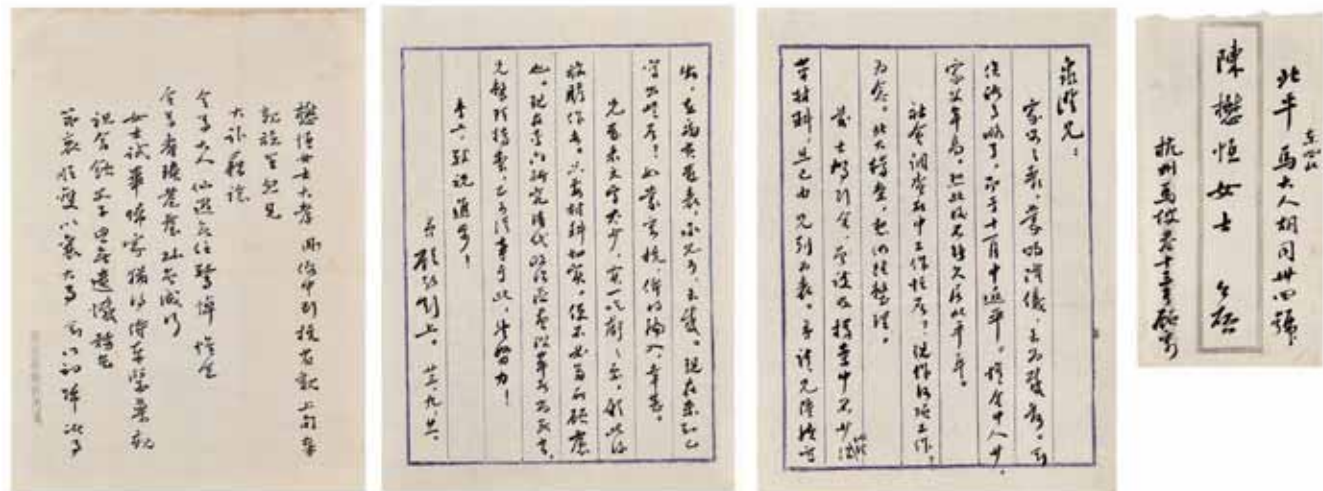
家国之痛，更让陈懋恒深感“历史”的使命。“历史是民族的生命线，是弱国的强心针，是求知的原动力，它的重要性远在任何学科之上”，因为从历史上看，“侵略民族对于被征服者第一件工作，便是消灭它的历史，文字还可保留，历史必当湮没，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历史的价值了。”1947年，她主编《世说》，提出“要改造社会，努力开创一条民主的新路”。在思考中，她决心以手中的笔书写历史，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她创作了《乌孙公主》《汝敦妻》等弘扬爱国精神的历史剧；也萌生《中国通史演义》的创作初衷。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的老师顾颉刚先

生邀她撰写中国通史的第一册——《中国上古史演义》。由于早就积累了丰富素材，她仅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巨作，“为今后全部通史演义的完成安置了第一块奠基石。”书一出版立即畅销，遂一版再版，直至七版。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她接连又撰写《秦楚演义》《春秋演义》……不幸的是，动荡混乱的政治生活又开始了。一项“右派”帽子，让赵泉澄与她离开了历史研究院，而被发配到一所财经学院里以“糊信封”为业。但是她并没有真正离开历史的研究，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在晕黄的灯光下执笔写作，那些汨汨流淌的字里行间，依然倾注着一位历史学家的热情与不泯的信念。夫妻二人参加《辞海》历史地理小组，从事该书编写工作，虽然出版时因是“右派”和“右派”家属，二人连署名权都没有。

“反右”之后，又开始“文革”，无可幸免的时代捉弄着她，捉弄着她身边一切同好。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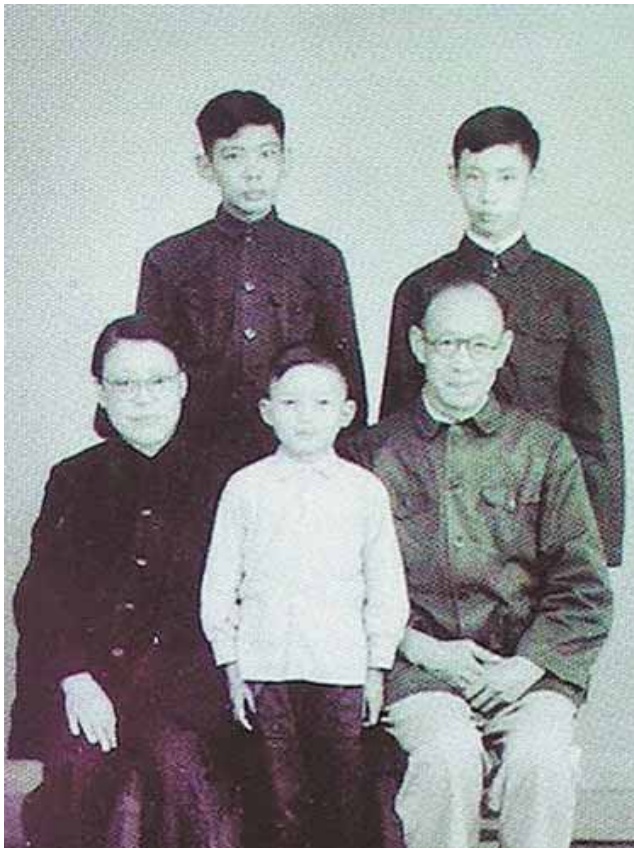


顾颉刚写给陈懋恒的书信

好友、诗词家、画家陈小翠女士在“文革”一开始，家中即被抄封，为躲避所任职上海画院的各种批斗，遂逃到陈懋恒家中，以为可得栖身。这一段时间，她俩与上海文史馆馆员郭同甫先生三人还吟诗谈词，探讨卜易之事，不以风云为虑。然而两个月之后，赵家也受到冲击，赵泉澄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家属被株连。所存文物丧失殆尽，赵泉澄进了牛棚，大儿子赵之华24岁入国家体委第一批围棋集训队成为中国国家围棋队队员，此时在少体校，亦被打成“牛鬼蛇神”，原来的哮喘病更加严重。小儿子赵之云，原在福建省围棋队，此时亦被解散，去沙县插队劳动。陈懋恒自身也被居委会监管，每天必须清扫弄堂及掏阴沟。陈小翠亦被上海画院勒令揪回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临行前陈小翠说：“我在这里度过的一段日子，是我晚年最愉快的时光，令我终生难忘。”她特地作诗一首赠予亲爱的懋姐。《有感谢赵夫人》：“狼狽青毡百不存，解衣推食女平原。乞天暂缓三年死，我有人间未报恩。”她知此去前程未卜，故留下了毕生的诗稿《翠楼吟草》五编，并嘱咐，如有朝一日见到她女儿翠雏，请转交于她。陈懋恒郑重地接受了。后此书由陈懋恒的儿媳、围棋手、文物鉴定专家许宛云在她逝后转交翠雏。

五

“吾平生所好，未有逾于撰稿者”，这是陈



陈懋恒一家 1957 年全家福

懋恒的自述。然而在动乱之中，家庭出身、学识、“右派”丈夫以及言论，都是获罪的理由，因此，劳役占去了她白天的时间，晚间，在灯下的是写不完的检查。但她依然深信春天已近，依然悄悄收集散失的资料。然而，就在1969年9月的一天，陈懋恒给身在沙县插队的小儿子赵之华写了一封信，信称：“呜呼，木秀于山风必摧之。吾今岁恐有大患。虽然，吾尝发愿，广写历史读物，俾使芸芸学子无埋头故纸之劳，而粗知中国史实，以激扬其正义爱国之心。今史料渐衰，而岁云暮矣，彼苍天者宁有知耶？如斯文

之未丧，或能鉴吾之诚。来日大难，倘有不可免者，吾宁折臂断足以当之。假吾数年，以成吾志……”赵之华以为，母亲从来不会作此激切之言，心颇挂虑，但又觉母亲心忧多虑才作此言，故心存侥幸。

10月13日清晨，天尚未明，陈懋恒即被催促劳动。高度近视的她双手提扫帚、铁钳、铅桶等工具下楼时失足跌倒，颅底骨折，七窍流血，赍志以没。终年68岁。

陈懋恒的儿子赵之华与赵之云

“大小赵”是中国围棋界颇有影响的优秀运动员。他们学习围棋，启蒙即是母亲陈懋恒。赵之华12岁时参加初中升学考试，语文考分名列第一，他母亲买了一副围棋送给他，以示奖励。在母亲指导下，之华和7岁的弟弟开始学习并迷上围棋。那时，福建郭同甫（郭曾量，署理两江总督的郭柏荫之孙，琴棋双佳）寄寓在赵家，是个颇有名望的棋手，赵氏兄弟便拜他为师。同时，陈懋恒还让二子拜诗词家、好友陈小翠为师。所以，二赵在不论是围棋、诗词歌赋还是古文、碑帖、书画、古琴方面都有极高造诣。

关于他们初学围棋，还有一段传闻。母亲陈懋恒指导二子。头两年，赵氏兄弟虽弈兴甚浓，但却从未见过围棋谱。一天，父亲从附近炒货店买回一包油氽花生，包花生的纸竟是一页日本棋谱，兄弟俩如获至宝，急忙赶到那间炒货店，将

已被撕剩半册的棋谱买回。从此，赵氏兄弟如饥似渴地摆棋谱，并到处去觅棋谱，不论内容优劣，见书便买。几年内收藏的中外棋谱、棋刊装满了书橱。

赵氏兄弟第一次出外弈棋，便是到襄阳公园。那次，兄弟俩约了一个棋艺比他们略强的同学同去，当时少年气盛，自以为学棋三年，颇有成就，可以出去“闯荡江湖”了。在襄阳公园遇到老棋手窦国柱，由那位同学出战，窦国柱让五个子下了一局棋，结果被杀得片甲不留。赵氏兄弟目瞪口呆，吓得很久不敢再到公园去。郭师有一帮围棋名手好友，所以赵氏兄弟有了向老棋手学弈的优越条件。他们的弈棋才华被顾水如、刘棣怀所赏识，老棋手很乐意免费与他们弈棋，给予亲切指导。

20世纪60年代初，赵氏兄弟与陈祖德、吴淞笙成为全国瞩目的新中国第一代棋手。1964年二赵同时被国家体委授予第一批“围棋四段”（当时最高段为五段）。

哥哥赵之华自幼患有严重哮喘病和先天性眼球震颤症，常卧病在家，勤读书籍。由于父母都是历史学家，他12岁时便已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通读一遍。兄弟俩对古文、诗词都有相当造诣，且弹得一手好琴，对棋史也很有研究。这是一般围棋高手难以企及的。

赵之华棋风硬朗，功夫扎实，1960年6月加入中国围棋队，在上海迎战首批日本围棋队。也是这一役之后，上海市长陈毅提出：国运衰、棋

运衰，国运兴、棋运兴，文娱和棋类活动也应该受到关注与支持。

赵之华为人朴实忠厚，棋友遍及全中国。上海棋手常到他家去弈棋或借阅棋书。棋友对局中遇到疑难问题也去请教他，他能告诉你，这个走法是某年在某项比赛中谁先下的，后来某人又走出一种有趣的新变化，而现在最流行的下法又是什么。棋友们对他的博闻强记都表示钦佩。外地棋友常来沪托他办事，或要求找对手下棋，他都热情地帮助解决。住宿有困难者便与他同榻而卧。在“文革”中围棋遭禁时期，他总千方百计借日本棋刊，抄录下其中的最新棋谱，分寄给各地棋友。他阅读中外棋书和传抄棋谱之多，恐怕全国没有人能比得上。

赵之华“文革”中在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任围棋教练，著名棋手曹志林、华以刚、邱鑫、杨以伦、谢裕国、韩启姚等都是他的学生。少年时的钱宇平、王群、马亚兰等也都曾受其指导。可以说，他培养了整整一代的上海棋手。1977年，他因病住院期间，还与少年时的杨晖弈了指导棋。1978年，正当上海市体委准备将他调入《围棋》月刊编辑部时，一次严重哮喘引发心力衰竭，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逝世，在全国围棋界引起了一片哀悼之情。

受陈毅老总影响颇深的叶飞将军时任福建省委书记，二位将帅对围棋象棋都很重视。因此陈毅提议，要在福建培养围棋人才，光大福州围棋传统。叶飞将军就把赵之云从上海引进回榕筹建

福建省围棋队。彼时是1963年，赵之云才22岁，住在法海路现在的巾幗大厦附近。赵之云从小受双亲影响，与哥哥一样，喜欢中国文化。因他孤身一人在故乡，难免清寂，而且有“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的担心，为此，陈懋恒把儿子托于一位姐妹、福州五中一位化学老师处，人称此师为“化学祖母”。攻学围棋之余，赵之云常在宫巷附近的文物总店、古旧书店闲逛看书，在此他遇到文物专家周端。周老师又将他引见给林健。林健与周端都是福建省篆刻界、书画界前辈，真可谓物以类聚。

然而，赵之云貌似属于“人才引进”，却未享有“引进”的待遇。在福建，赵之云的命运也是相当波折。而且像围棋之类的运动，没有对手交流，没有赛事或棋局的各种信息，在封闭之中他一待十几年，自然是不幸大于幸。其后，棋队解散，他亦失去工作，只得下乡插队。幸而以赵之云的聪明，到了70年代恢复围棋的时候，已晋升六段，在1975年全运会围棋赛中获全国第四的好成绩（那一年，聂卫平第一，王汝南第二，陈祖德第三，赵之云第四）。

1983年，他告别运动员生涯后，除担任裁判和指导培养青少年棋手外，还担任《围棋》月刊编辑，从事写作和围棋史研究工作。至1996年8月英年早逝前，他先后编著了围棋专著数百万字，并且是全国唯一一个读遍《寄青霞馆奕选》正续编（共16大本，近千盘对局）的棋手，此书被认为是“集清代国手对局大全”。

悠悠一脉琴江情

张小菁

曾经一直以为，我是没有故乡的人。长乐，我户籍本上的“籍贯”所在地，虽然无数次填表时写下它，但它在我心里似乎只是父亲的故乡。在那里，有一个琴江村，是父亲从小生长的地方。但因为老宅已无存，亲友也都在城里，“琴江”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字。直到，我成为母亲。

生命的延续仿佛冥冥中给了我一股力量，牵

引我探寻家族的故事，思考生命的来处。

—

蜿蜒的城墙，北门口的城楼，老宅大院里的皂角树，琴江小学堂里琅琅的书声，毓麟宫里上演的台阁，城外云门寺悠扬的晨钟，趴在沟渠边钓螃蟹的小伙伴，还有那首童谣“四个城门四个井，关起城门都是亲，不是亲来就是戚，乡邻友爱似亲戚”……故乡琴江，在父亲反反复复沉浸其中的讲述中，开始变得清晰而鲜活，慢慢有了温度。

那一年，2006年，古稀之年的父亲开始编写《图说琴江新志》，想把故乡的史料作抢救性的整理和补充。在他搜集和珍藏的资料里，最重要的一本便是民国十一年（1922）编写的《琴江志》，作者黄曾成是琴江人，清末的一名秀才，民国后成为琴江小学堂的老师。

“吾乡僻处海岛，其间从居原委及忠孝节



琴江村毓麟宫

义之辈出者多淹没不闻，可为长太息者也……”在《琴江志》序言中，黄曾成发出深深的慨叹。民国十一年（1922），社会变革风起云涌，乱世纷争内忧外患，我常想象这样的画面：一名瘦弱的教书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把琴江北门口藏书楼中千余册已落满灰尘、腐蚀近半的旗营史料细细分类整理、记录、编校……

直至今天，我依然对这位未留下个人资料也不知其模样的琴江人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感恩。是他，在动荡的岁月中敏锐地意识到琴江独特的历史不能消散，书写刻不容缓，以一介书生微薄之力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可以回溯来处、了解族群历史乃至研究清末福州相关历史的一本志书。《琴江志》在新近出版的卢美松主编的《福州通史简编》中被列为民国时期福州较有影响的乡土志之一。

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出于对台湾和东南海防的重视，在琴江建立了三江口水师旗营，作为清代四大水师旗营之一，它的建立比马尾近代海军还早150年。沧海桑田，今天的琴江，已成为福建省知名的满族聚居村落，保留着全国唯一较完整的清代水师旗营遗址。历史上的琴江人不仅尚武，曾在甲申中法马江海战中英勇抗敌牺牲巨大，在民国后又为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了众多人才，更有重教崇文的传统——清朝时这里兴办官学，出了两位进士、上百名举人，民国后又多



琴江村原有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如今仅存南门

有留洋者，或走向四方或回馈乡里。也正因为这样，家乡历史的书写才能一直延续至今，文脉不断。

二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斗转星移70年，1993年11月，一份同乡会会刊《琴江》，开启了新一轮思乡的文脉。创办者是一群和父亲一样热爱和眷恋着故乡的老人，他们，来自海峡的那一边——台湾。

“‘琴江’，不仅是地理上的名词、我村的所在、会刊的称号，其字义尤具声势，如悠悠琴韵，如浩浩江水，那如诗的意境、如歌的清扬，你怎能不倾心动念？那是我的故乡啊！年轻的你，或许体会不出如此的感受，只因你生于他乡或长于异方，但血脉的牵连、传承的归属、数祖

的根源，人亲、土亲衍生出的乡土情怀，是自自然然明明白白的。当有人问起你的老家来，不必犹豫，老家就在那闽水之滨，鹤山之旁，洋屿琴江！”

这段荡气回肠、浸润着赤子之心的文字，正是琴江旅台同乡联谊会第二任会长、《琴江》会刊创办人贾承谟先生所作。他是清末福建船政学堂教官贾凝喜之孙、民国海军舰长贾珂之子。当年他写此文是希望能唤醒台湾年轻一代琴江儿女的寻根之情，但多年后对岸的我读到这些滚烫的文字时，同样被深深打动。

台湾有几十户琴江乡亲。战争把无数家庭分割在两岸。20世纪90年代初，两岸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贾承谟先生第一次踏上返乡之路，再见故土亲人，有欣喜也有无限惆怅。回台后，上了年纪、身体状况欠佳的他几经周折，创办了会刊《琴江》，希望以此传播乡音，架起海内外乡亲的联谊之桥，并推动有实力的乡亲眷顾故乡、建设故乡。

刚开始，由于这份会刊只在台湾发行，呼应者不多，稿源极缺，无法定期出刊，贾老也常感忧伤与力不从心。他在《琴江》会刊中一次次深情地呼唤：“无论你在哪里，请听原乡呼唤，你有资格来寻觅、认知、亲近、关怀这片土地，感受一下归属的况味，沾一沾那乡土的情分……”渐渐地，在他和另外几位台湾乡亲的努力支撑与真情感染下，《琴江》会刊在台湾乡亲中有了名气，越来越多的在台乡亲、大陆乡亲开始投稿，

忆故乡故园故人、琴江信息、满族文化习俗、生活小感、寻根诗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会刊《琴江》在台湾一共印发了15期，外加一期特刊。

而1998年10月出版的这期特刊让两岸乡亲尤其激动。它由两张琴江手绘图组成。一张是琴江古稀老人许辉凭记忆绘就的《三江口水师旗营地图》；另一张是台湾乡亲张长卿老先生在此图基础上绘就的详细的《营盘里（今之琴江村）十二条街道及各户姓氏一览表》，图中密密麻麻地标明几十年前他离乡时上百户老宅的位置和户主的姓名！这是惊人的记忆，更是浓烈刻骨、隔着茫茫海峡的乡愁！

十多年后，时年已87岁的张长卿先生再次发挥他的绘图特长，拿出更惊人的成果——老人家一笔一画手绘了一幅4米长的《清代福建水师治安防御图》。为绘就此图，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间一趟又一趟辛苦奔走，感动了工作人员，帮助他找到了上百份珍贵史料，其中包括赴台征战清军使用的火炮图、清乾隆皇帝在《清军围捕林爽文图》中的御批等。老人不仅将重达十多斤的珍贵史料复印件带回，还把它们全部赠送给长乐的地方史研究者。

凝聚乡心办会刊，慷慨解囊建设家乡，修建琴江满族陵园，兴建纪念马江海战阵亡琴江将士的抗法烈士陵园并组织公祭活动……多年来，张长卿与贾承谟二位乡亲为故乡殚精竭虑，也深深地影响了大陆的乡亲。

三

2000年，贾老年事已高，编写会刊的接力棒传到大陆乡亲手中。这一办，就是18年。一份薄薄的会刊，在一位位老人手中认真地传递、反复地品读，那是一份沉沉的乡情。

也是在这一年，福州的琴江乡亲组建了联络组，越来越多散落在福州的乡亲找到了“乡音”。在一次次相聚后，大家达成共识：要将琴江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下去，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丢失，而首要的任务是抢救和挖掘琴江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那么，第一件事做什么呢？修复“孝友坊”！

矗立于琴江大街口的“孝友坊”是琴江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清同治元年（1862）为表彰孝亲爱友、扶贫济困的乡贤赖通照而奉旨建立的。经历“文革”后，牌坊主体虽基本未损，但部分

石雕构件已毁坏或缺失，乡亲们希望尽快补上恢复原貌。于是，大家你100元我100元地捐款，一边分头寻找相关史料依据，遍访村中老者。在搜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并确定“修旧如旧”的方案后，请来石匠雕刻。三个月后，“孝友坊”修复完工。剪彩当日，许多外地乡亲都赶回来观看，爱乡情怀又一次被点燃。

此后，父亲又根据《福州驻防志》等大量史料，还原出旗营立营碑内容，乡亲们捐资复刻立营碑，将其立于原先仅存的一小段残碑旁，让参观者对旗营立营史有完整的了解。紧接着，搜集汇总琴江相关史料，在原琴江小学堂内举办《三江口水师旗营历史与民俗风情》图片展，这一展，影响甚大，不仅当地媒体，连一些国内知名媒体都撰文报道，研究者和专家也纷至沓来。

故乡被遮蔽的光华终于重新绽放。

近年来，福州乡亲还不辞辛劳抢救性地编撰了《洋屿琴江教育回顾》《琴江史料拾遗》等近



孝友坊



戍边碑亭

10 本书籍、册子。为记录福建省最濒危的地方语种——在“方言孤岛”环境中存留下并仍在使用的琴江话（又称“洋屿话”），老人们组织起来共同回忆，记录文字、拍摄对话视频、刻录光盘……为做这些事，已近耄耋之年的他们甚至学会了使用电脑等现代工具。他们有时会与父亲相约来到家中，看着他们戴着老花眼镜，翻开各种资料书籍，兴致勃勃地讨论的情景，我总会感动地想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那四个字：文化自觉。

2007 年，父亲与另一位乡亲合著的《图说琴江新志》出版，而此前不久，我的第一篇书写故乡琴江的散文《八旗猎话琴江》发表了。作为年轻一辈，我对家乡事务投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尽微薄之力奔走。每念及为“留住琴江”而倾尽心力的老人们，心中仍深深惭愧！

继 1999 年被评为福建省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后，2010 年，琴江又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然而，同中国的许多乡村一样，在经济开发与新一轮旅游开发的热潮中，其文化保护也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例如，村中一些改造失了原味，被忽略遗漏的文物也依然存在，而村子对岸的水泥厂不仅填埋了过去水师操演地剑屿的遗址，也破坏了周边生态环境，乡亲们一直呼吁搬迁水泥厂，老人们还整理出详尽的琴江历史文物与旧貌的图文资料，诚恳地提出保护规划建议。他们执着地想要留住故乡，恢复记忆中的一点一滴，但也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来说，一群沉浸于过去的老人的话语是常

被淹没和不被理解的。他们虽感无力但仍怀抱希望：希望故乡变得慢一点，多留一点旧日的、心中的模样。

2012 年，两岸乡亲共同捐资修建的琴江满族陵园落成，其修建初衷正是台湾乡亲提出的“以有限的方圆之地，纳无限四海乡心”。落叶，盼归根。而与此对应的是，一位位老乡亲正相继离世：会唱台阁戏的老人走了；80 岁高龄时仍能默下几十首琴江儿歌曲谱的黄茂秋老人走了；为抢救家乡方言撰写《琴江话》的李克金老人走了；每年七月初三组织放水莲灯祭奠马江海战烈士的许辉老人走了；2017 年 11 月，贾承谟老人也在台湾去世，享年 91 岁，他曾说：人一辈子其实就在两个地方，一是他乡，一是故乡。

“一片清辉月满舟，水天相映夜光浮。耳边似觉琴音奏，韵出空江听水流。”

在这清冷的季节，书写一脉乡心，想起这首《长乐六里志》中描绘琴江的古诗。那些魂牵琴江的游子啊，是否都已回到了故乡，听静静流淌的江水，眺望北门口的榕树林，俯瞰那仍有记忆影子的老屋小巷，寻里面传出的快要消逝的乡音？

琴江，我遗憾不曾生活过的故乡，又因为这些先辈而爱上的故乡，即便终有一日你也会如我们的肉身一样敌不过时光而消失殆尽，但你会永远活在诗里、典籍里，更在深情延绵的血脉里，生生不息。

远洋鼓山边

李善旺

远洋是一个美丽而古老的乡村，地处巍巍鼓山之麓，悠悠闽江之滨。福州曾有“五凤朝阳生丽水，九龙经脉出金汤”的美誉，而远洋算是其中一只漂亮的大凤凰。

古时，福州东郊之外是一片水乡泽国，从闽江到鳌峰洲直通前屿、浦东、上洋直至洋里，呈一个两江合并的大型江口，潮水一涨，江水连天，碧波万顷，犹如汪洋一片，故称“远洋”。然而，古时的福州“洋”字也代表田地的意思，“远洋”是个地名，凡是地名总有个落脚点，那是一片生长着中国特有的古老残存植物水松的湿地森林。随着历朝历代的围垦造田运动，远洋乡音称水松为“水仙茫”的水松林四周渐渐从湿地滩涂变成上千万顷良田，乡民过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远洋有沃土千顷，沙洲万亩。潮起时鱼虾水面嬉戏，水草滋长；潮落间蚢蜆滩涂横行，蚬子满沙洲。这里土地广阔肥沃，水源丰沛，即使旱涝，也易丰收。故有俗语称：“买田要

买远洋鼓山边。”

远洋有许多历史故事及乡风乡俗。其中二月二“断路”的习俗，最早可追溯到汉朝闽越时期。相传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今福州）”。后来无诸的儿子郢继位，郢的第三个儿子名寅，又叫白马三郎，民间恭称“白马王”。白马三郎有勇力、善游猎。传说他某日出城到郊外游猎时，路经福州东郊鼓岭脚下，大中午不见乡间有炊烟，只闻溪涧传哭声，便走近问个缘由。原来此地有条鳢鱼成了精，残害百姓，每年都要求给其供奉一对童男童女。父母哪里忍得自己的孩子拿去喂鳢？便在儿旁哭泣。白马三郎听了大怒，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天下，岂容一条鳢鱼精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于是白马三郎便要除去此害。白马三郎引出鳢鱼精与其大战三天三夜，弯弓射中鳢喉时，鳢头将断未断之际大吐水，又摆尾将精疲力竭的白马三郎连人带马打入水中溺

亡，顷刻间水漫福州。三天后，白马三郎的魂魄从闽江口归来，从远洋上岸，这一天正好二月二，白马三郎的圣诞。“水鬼上岸，英雄落魄”，远洋人为了维护白马三郎的尊严和威仪，二月二这天尽量回避，寄宿外村亲戚，或者晚上不出声响，久而久之便成了乡俗，一直延续至今。远洋乡俗称二月二“断路”。后来，乡民用福州俗语“石厝都会溜过墙”来形容当时山洪之大。

据记载，五代闽国时期，福州田地分为三等，上等的肥沃田地多赐给寺院，而鼓山边的远洋就是上等的肥沃田地。当时闽王王审知赐给鼓山涌泉寺的田地多达 8.4 万亩，土地之多，居福

州各寺院之首。寺院田太多，除涌泉寺僧人耕种外还雇请山脚下乡民耕田，看管种田的僧人乡民称其为“田头师”。宋朝后期，各寺院衰落，涌泉寺寺院田只剩下 1.3 万余亩。而明朝重道教轻佛教，寺田失去管控后多被他人占有。那时的远洋已呈现出乡在水中、水在乡中，多条小港贯穿整个远洋的地形地貌。从鼓山上俯瞰远洋，犹如“飞凤归巢”，故得美名——凤洋。

据《明实录》记载，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国，致送国书，通知即位，建元洪武，封察度为“琉球国王”。琉球国中山王察度俯首称臣，遣王弟



泰期等随杨载一同入朝进贡方物，从此中国与琉球正式建立藩属关系。凡逢贺天寿圣节、贺登极、贺元旦、贺封、迎册，琉球国王都要派使臣来华。同样，每位琉球“国王嗣位，皆请命册封”。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扬威，扶持琉球国前来朝贡、贸易，特赐闽人擅长造船航海的三十六姓人家移居琉球国，他们“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管，为指南之备”。琉球国王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叫久米村的地方居住，称为“唐营”，

后因显荣者多，改称“唐荣”。此次由官方派遣的海外移民活动是中国古代中绝无仅有的一次。而侯官县壁团洲（今闽侯新洲）人金瑛也在其中，之后成了琉球国唐营（久米村）金姓望族始祖之一。

至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琉球国第五代国王尚元继位。因平内乱，又因海路不宁，继位第二年，琉球国王尚元才派使者入朝进贡并请袭封，并将从倭寇手中救下的六名中国人送还明朝廷，派曾任家将的金伯通负责护航船队。出使途中船队冲破倭寇劫掠，顺利登陆福州，使臣进京朝贡，金伯通完成使命，在闽待命并回乡认祖联宗。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明世宗命刑科给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际春为册封正副使。因海寇不时出没，未及开洋。据《中山世鉴》记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氛稍靖，明世宗派遣册封使到达琉球国册封尚元为王。本年秋，王遣王舅穆源德、长史蔡朝器、楷册使郭汝霖等入京，奉表献方物，谢袭封恩。金伯通将军再次奉命护航此次船队，船至福州闽江口，不料遭遇暴风雨袭击，不幸落入江中丧命，其尸体顺潮水漂入内港远洋之滨。传说乡民见到浮尸将其推出，然又漂入，“三推三入”间，乡民觉得灵异，便将浮尸翻正面，尸体面色不改，发甲照长，异象丛生。见身上有腰牌，才得知是琉球国金将军。乡民便上报官府，同时将遗体作了防腐处理并塑以肉身，在远洋江埂建庙祀之，尊敬如神。嘉靖四十四年（1565），因金伯通护航抗倭有功，明



风洋将军庙

世宗敕封金伯通将军为安东侯。之后琉球国凡是派使来华朝贡，都会遣人前往凤洋金将军庙拜祭。明清地方官员出使海外，乡人水上行旅、龙舟比赛等活动，也必往该庙上香祈祷。

在明清两朝，福州人对琉球国和琉球国人十分熟悉，琉球国派遣国人来福州学习、经商，从福州入京朝贡等交流频繁。古时，册封使与闽中诸友郊游时，登鼓山，望琉球，赋诗歌，抒情怀，在当时颇为流行。如明朝闽中十大才子之一的王恭的《草泽狂歌》中收录的《游鼓山天风海涛亭》云：“高亭上与翠微连，漠漠风涛际海天。吴越百城飞鸟外，琉球孤岛断云边。灵源洞古人稀到，青草池空凤杳然。深愧远公相问姓，自非玄度亦逃禅。”《送人游鼓山》云：“灵源洞口白云飞，君去凭高入翠微。闽越故城关外小，琉球孤屿鸟边微。天花寂寂逢僧宇，林吹飘飘扬客衣。若对凤凰池上月，顿令心地亦忘机。”清朝吴嗣富的《登鼓山》其中一首云：“紫翠横空一解颜，登临有兴任跻攀。攫身劣削云中路，决眦琉球海外山。龙首倒流泉韵绕，龟趺半蚀墨痕斑。年来已悟忘言妙，此日喟情未肯删。”《绛雪山居诗钞》中瑞麟的《登鼓山宿东际楼》（第七首）云：“江月天风句，曾闻劣削游。欲倾沧海浪，一写暮山秋。余亦耽高咏，诗还感互酬。会当凌绝顶，双髻指琉球。”龚文龄的《天风海涛亭》云：“才从喝水岩前过，又上危亭踏绿莎。瞰到琉球双髻影，海风吹月晚潮多。”

清顺治二年（1645），见南都已完，郑鸿



远洋“九肩挡”石界挡

逵、黄道周等人奉迎南明唐王朱聿键入闽。在此过程中南明唐王的御前侍卫孙惠成不顾自身安危救了唐王，背着唐王过山脱险。这一年，唐王于福州建都，登基称帝，改元为隆武。传说隆武皇帝为了表彰孙惠成救驾之功，赐官于其，孙惠成不要。赐黄金也不要，就要田地。于是隆武皇帝特赐石界挡条石一面，封地由起点至终点。远洋古来就是上等田地，孙惠成选中远洋田地，由远洋中心扛起石界挡，从田挡走向江埂，起初健步如飞，后越走越远，肩上越来越重，经过九转换肩之后，力疲弃石。石界挡落地江埂，远洋中心至江埂一带的田地即为孙家田地。后隆武皇帝命

人将石界挡抬回起点并刻上“九肩挡”，既记录石界挡经九转换肩，又寓意皇帝“一言九鼎”。孙氏宗祠也于“九肩挡”起点建立而起。隆武二年（1646），福建门户敞开，清军长驱直入，隆武皇帝出奔汀州，被清军追击擒杀，隆武政权灭亡。

清康熙年间，远洋万亩沙洲被围垦成大片田园与鱼池，日久出现了田地收入归属纷争。官司告到福建巡抚，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正因鳌峰书院这家官办学府经费捉襟见肘而发愁，便将沙洲田地划归鳌峰书院所有，保证鳌峰书院每年有一笔固定的经费收入。因这片沙洲田未有名，今又划归鳌峰书院，遂以“鳌峰洲”定称。清朝五口通商时期，在福州

“田买远洋鼓山边，厝买龙岭水井边”的说法已经非常流行。清同治十年（1871），日本渐渐控制琉球国，琉球国少来朝贡，贸易往来也少了，直至琉球国覆灭断了往来。远洋江挡处的凤洋金将军庙也渐渐少了香火，年久失修，每逢大洪水就被水淹，久而久之不是办法。远洋乡民遂于清光绪元年（1875）筹资将破败的凤洋金将军庙搬至如今

的远东村江畔重建。每年正月十五“摆夜”，点蜡烛祈福，农历三月三定为金将军华诞。

光绪初年，福建署陆路提督孙开华多次莅临远洋孙氏宗祠进香谒祖。宣统二年（1910），孙开华之子孙道仁任福建提督，借远洋孙氏宗祠进香谒祖，结识孙氏宗亲。辛亥革命福州起义前夕，孙道仁借远洋孙氏族亲孙元燎的蚬埕之地，在一艘夹板船上开秘密会议部署起义事宜。后中国同盟会会员孙本戎招募远洋青年加入福建革命军，一同参加了光复福州的于山战役，为推翻封建王朝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远洋由七保分成了

远东、远中、远西三村。凤洋金将军庙与孙氏宗祠先后改作幼儿园和远洋小学。后来学校陆续建成搬出，庙宇、祠堂恢复原貌。2005年凤洋金将军庙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远东村孙氏宗祠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因远东村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关系，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赠送远东村一尊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立于远东村辛亥革命纪念广场。



远东村辛亥革命纪念广场孙中山先生的铜像

福州话之美

游德馨

方言育于民间，是富有草根性的活泼、生动的老百姓语言，乃构建和谐邻里、乡土文化、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语言音符。福州话在八闽方言中占有重要地位，远在唐末五代时期即已定型，2000 多年来不断发展充实，成为今日十邑乡亲的共用语言，是源远流长的福州文化的积淀和载体。我在福州市生活 70 多年。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新店区溪里村，听到一位老农妇用方言形容旧社会农民的凄凉生活。她说：“起半暝、咽三更，数石板、饿肠肚；三月日子长、糟菜塞腹肠；月

牙鑵面梨花鑵，有柄枕头没柄伞；古怪眠床十六脚。”大意是：“半夜起床，饿着肚子，挑着担子，一步一步挑上北岭。饿得无奈时只好用腌菜充饥。锅盖破得像月牙，锅子破得像梨花。打草鞋用的木锤子当枕头，斗笠当雨伞。床板不够长，中间架着凳子，才有十六个脚。”寥寥几句道尽了旧社会民生的艰辛。

千百年生活积累和经验总结形成的福州话农谚，在气象测报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是观测气候、预防灾害、安排农事的活字典。如在气候观





测方面有：早霞暮雨晚霞晴（早上出红霞，傍晚会下雨，傍晚出红霞，次日晴天）；芒种碰雾火烧溪（芒种那天有雾，会天旱）；白露秋风夜，一夜冷一夜（白露到秋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在农事活动方面的农谚有：九月冬才兴工，十月冬田里空（农历九月立冬才开始割晚稻，十月立冬晚稻已经割完了）；处暑时才当时，白露使没了使（间作晚稻追肥，处暑季节最好，到了白露追肥没有用）；早仔看龙舟，晚仔看中秋（早稻母穗五月节出，晚稻母穗中秋节出）。福州方言汇集了草根民众的智慧，是极富有表现力的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近年来福州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6个项目中，就有以福州话为表现形式的闽剧、评话、伢唱等3项。由此可见，福州

方言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力是得到公认的。

方言是无形的身份证，让人找到对故乡的认同感和归宿感。福州十邑远在海外的乡亲有几百万，只要一听到亲切的福州话，“老乡见老乡，拉呱福州腔”，人与人之间马上拉近了距离。

福州话虽美，但有特定的使用范围。在传承乡土文化、记忆乡愁、促进邻里及海外十邑乡亲的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爱乡与爱国的情结是一致的，使用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存不悖。方言和普通话各有着不同的使用范围，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都有着各自存在的必要。人们多懂一种语言，可多增加一份知识。普通话与方言都是宝贵的语言资源，都需要我们爱护、珍惜。

品读《一个人的世界》

林玉山

文如其人，从汪征鲁先生所著《一个人的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4 月版）可以窥见汪先生的方方面面。

“仆自孩提时候起，就特立独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顽冥混沌；而立之年后，竟能致力学问，且有了久坐的定力，却每每另辟蹊径，逆向思维，另立新说；进入暮年，尤喜领悟生命与宇宙的真谛，品味孤独与寂寞。”一翻开书卷，映入眼帘的就是作者把自己解剖得淋漓尽致的直白，给我们解读汪征鲁先生提供了一条捷径。

全书分传记、散文、杂文、序跋书评、诗词五个部分，给我们解读汪先生提供了全面而珍贵的材料。传记部分展现了厦门市委书记汪大铭、福建省委书记江一真、王直将军、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于明、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谢树森、福州一中校长陈君实、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福建中医学院党委书记朱旭、福建省立医院心脏科主任陈仁、画家汪天亮等人不寻常的一



《一个人的世界》 汪征鲁 / 著

生。作者对前辈、朋友、亲人的真挚情谊荡漾于字里行间。前辈、亲友、同事的正直、忠厚、勤奋、友爱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给予作者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是汪先生作为“一个人”的

基础。

汪先生是研究历史的，但其学识超越了历史的界域。整本书的文字优美，使人难以释卷，从中获得美的享受。“但小路，这浅色的带子永远牵动我的心弦，用她那一年一度的落叶飘飘，芳草萋萋。”作者的真情实感，无不敲击着读者的心灵，令人陶醉。《任性的呼唤》更令人惊喜。作者文学的功底强，他对外国文学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评论得非常到位，这是俄罗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代表作，表现了俄罗斯文学的感伤与咏叹，悲壮与激越，是在那黑暗的农奴制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性的呼唤。“今天，当我们党把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写到我们的旗帜上时，《木木》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但又很好的注脚。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性呼唤的苦难历程与人性的美丽。”评论精湛到位。

很多学者爱找汪先生写书评。就连汪先生的老师朱维幹先生的《铁苍文集》也请汪先生作序。请汪先生写序或写书评的还有杨国桢先生的《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福建师范大学主持编纂的《严复全集》、范启龙教授的《闽台近代风云》、叶青博士的《“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杨齐福先生的《近代福建社会史论》、廖深基先生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福建学生运动研究》、钟文荣先生的《真德秀〈大学衍义〉研究》、陈林博士的《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考略》、论文集《蔡京史论选编》、论文集《吕惠



《严复全集》 严复著，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

卿研究》等。这些著作涉及面广，但汪先生都能娴熟驾驭，给予真知灼见的评价。如汪先生指出《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有五个创新：其一，关于“海洋文明”的概念的改造或完善，即海洋文明具有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及动态渔业的特点；其二，在注意到西方海洋文明的成熟性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了中国海洋文明的不可或缺性与独特类型；其三，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其四，建构了中华海洋文明史的时代划分；其五，对中国历史上的海界与海洋权利做了拓荒性的研究。总结认为该书“着力建构中国特色的海洋文明论与中华海洋发展史学，具有发凡起例之功”。在《〈严复全集〉总序》中指出：“他译著中的按语及他的其他论著，涵盖了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逻辑

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近代转型及构建中国近代新学科体系中，严复的筚路蓝缕之功殊不可及。”汪先生的书评不但展现他的睿智、博学、真诚、灼见，还展现他方法的精当，即善于把著作与时代、作者为人联系起来，以此让评论站在更为真实的基础上，显现阐述的精当。如《〈铁苍文集〉序》中说：“然先生即使在人生的低谷中依旧不坠青云之志”，“先生鹤发童颜，意气风发，忘我地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斯人已矣，道德文章长存，嘉惠后学，其功甚伟。”又如在《清代闽台“三通”与两岸经济互动研究》序中说：“海洋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又出现了新的曙光。在这样的时候，重温历史，既可借鉴，又能获得智慧与力量。本书的问世，适得其时矣！”

汪先生是历史学出身的，历史著作有《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主编的《福建史纲》《中国史学史》等。但汪先生后来转向文化学，并取得骄人的成果。《闽文化新论》是一本近70万字的专著，真是发潜阐幽，发蒙启滞。指出昙石山文化类型、闽学、侯官新学是闽文化的三个形态，把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历史进程揭示出来，特别是书中反复论述的侯官新学难能可贵，是汪先生对闽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侯官新学”这一学术观点是汪先生的创见，并为学界所认可。2008年启动编纂、将要定稿的《闽台文化大辞典》在2017年7月末将“侯官新学”作为一个词条补充列入辞典中，作为《思

想与学术》卷中的一个学派、观点，这是很不容易的。这说明汪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极具创新思维，富有创见。汪先生指出：“广义而言，侯官新学是指在福建历史地理和区域文化的大背景下，在宋明以来闽学的漫漫与观照下，以及清朝末学这一地区中西文化之激荡交流中，形成的一个文化学派，其中包括林则徐、沈葆楨、严复、林纾等。”“狭义而言，侯官新学特指严复的新学思想，他是晚清新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晚清新学的极致。”“要言之，侯官新学的精粹表现为：以自然科学为本的思想；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自然观与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观；以数理逻辑为核心的方法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政治上以‘三民论’为核心的救国方略。”这些对侯官新学的论述是极有见地的。

在诗词辑中，收录了汪先生的25首诗词。这些诗词呈现了汪先生的心路历程，感情真挚，语言优美，意蕴深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好的回味。《天外飞来的小树》抒发了汪先生的读书情怀，“吮吸着中华文化的雨露”。《远去的风景》抒发了“人生是一次旅行，总有看不见的风景”的对人生的追忆。《春游》中总结了为人的经验：“从苦难中获得经验吧，在斗争中获得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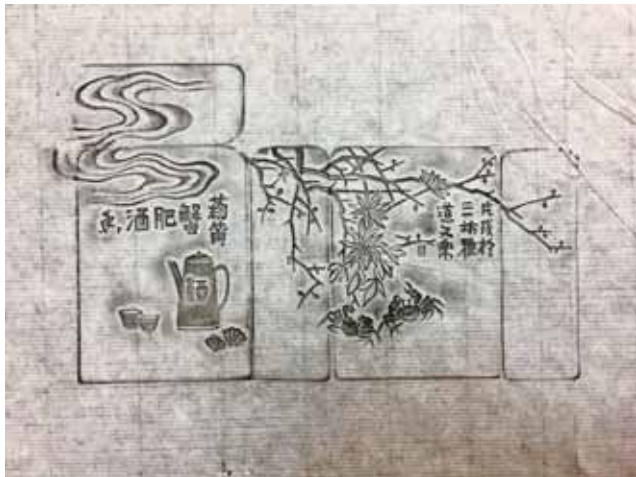
“我爱《一个人的世界》，它是汪先生的解读，他告诉人一个真理：一个人是渺小的，“渺沧海之一粟”；一个人又是博大的，“吾心即是宇宙”，“大千世界永远是红尘，一个人的世界有可能通向彼岸”。

方寸之间天地宽

青 山

我惊异于这样一件寿山石作品。它只有一寸见方，通体呈橘黄色，石质温润纯净，莹莹可爱。一面镌刻着一只朴拙的酒壶，未启盖，似已闻酒香；另一面则是几道横斜的疏枝穿过画面，三四朵菊花，粲然开放，吐露微馨，引得两只小螃蟹举螯欲跃。画面简洁生动，情趣盎然。菊黄、蟹肥、酒香，人生的况味，静静地伴着这金秋的气息，让人陶然欲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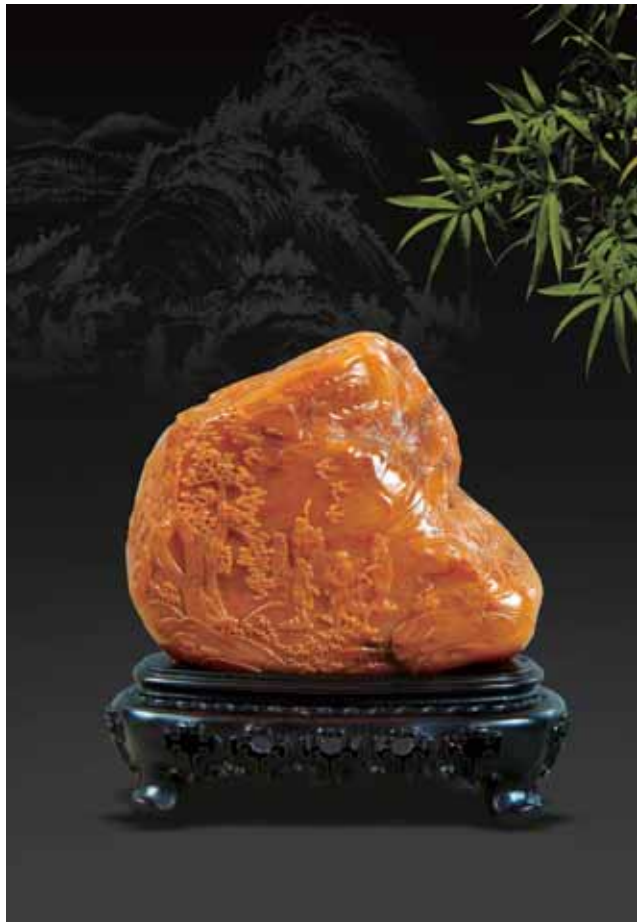
这就是王文乐薄意雕的艺术魅力。



《菊黄、蟹肥、酒香》拓片

文乐醉心于这门艺术。薄意是寿山石浅雕的技法，是介于绘画和雕刻之间的独特艺术。因雕刻层薄，而且富有画意，故称薄意。此法为清初的周尚均所首创。薄意由于刻线如画，所以也称“刀画”，最适合质优而材小的田黄石、水晶石以及山坑冻石的雕刻，有石皮者尤佳。寿山薄意雕素有“西门清”和“东门清”两大派。至清末，西门林清卿专攻薄意艺术，其作品熔雕刻、绘画于一炉，驰誉寰内，成为一代薄意艺术大师，被称为“西门清”。林清卿之后，有王炎铨、王雷霆、江依林、林文举等人，组成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西门薄意派”。而“东门清”的代表人物为林友清，其旗下有林友琛、林寿、郭懋介等人，作品多用尖刀，画面层叠，讲求意境，别具一格。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王文乐，论年龄还属于寿山石雕界的后起之秀。但他从艺的经历已经不短。七八岁，还在读小学的年龄，他就开始学艺。他自小居住的鼓山后屿村，是寿山石雕东门派艺人的聚居地。西门派的大本营扎在洪山桥，而东门派的大本营就在后屿。这里匠人云



《富春山居图》

集，作坊林立，指间艺术诞生了一件件撩人心扉的人世瑰宝。

文乐是天生的石痴。他从小的玩具，就是形形色色的寿山石。还在孩童时代，他就整天泡在艺人们的雕刻作坊里，一边赏玩石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手上出神入化的功夫。王文乐没有正式拜过哪一位大匠为师，但耳濡目染，心领神会，渐渐地说得出各位大师的技法特点。看着看着，手心发痒，于是他央请父亲购买了全套

刻刀，一头撞进石雕行业。也许，正是这无师之师，让文乐能博采众长，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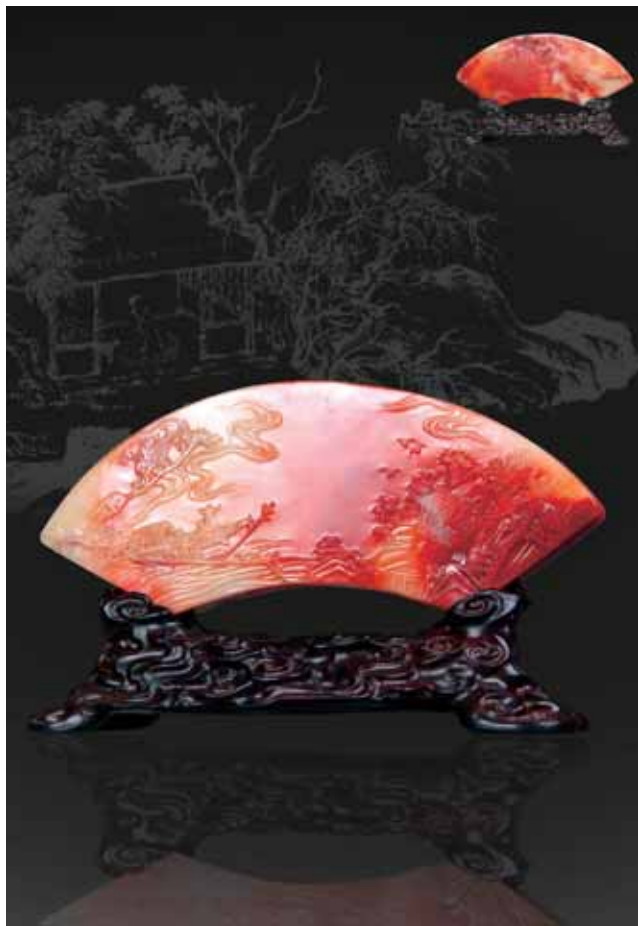
从爱石、赏石到知石、治石，是一位石雕艺人必备的品质和成功的要素。文乐爱石，他的工作间、卧室乃至书案上，到处摆放着或圆或方的寿山原石。即便出门在外，衣服口袋里也还揣着块石头，时时掏出把玩，想象着它成品时的模样。只有每天看着一块块圆润晶莹、色彩斑斓的石头，他心里才感到踏实和一种难以掩抑的愉悦。

于是赏石、相石、读石、解石，成了他生活的常态，与石为友，与石对话，让他的人生充满了快乐。相石，是雕刻的第一道工序，考验着一位艺人的眼力、学养和禀赋。雕刻界历来有“一相抵九工”之说。而薄意用材相对名贵，相石尤显重要。对于文乐来说，这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功课。他会将案上这一块块形态各异的石头，翻来覆去地摆放着，从不同的角度细细地端详着它们的模样，揣摩着、想象着作品应有的姿采。谁说石不能语？在文乐眼里，石头都是有生命的，石们的语言，隐秘而独特，他要从它们的形状、色泽、纹理乃至轻轻摩挲的手感中读出来。有时，观察久了，他甚至闻得出从石头深处透出的些微气息。

薄意是一种隆起的绘画，其妙处在于方寸之间，意象纷呈，韵味无穷。文乐雕刻，尤其注重作品的内涵。比如，他创作的杜陵石《秋水壶》，构思独特，石形恰似一把茶壶，远山近水

皆纳于壶中，而在山水之间，濠水桥上，是两位春秋智者庄子和惠子的精彩对话。庄子说：“鱼从容出游，是鱼之乐也。”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则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一块施以薄意的石头，于是让人凝视良久。而《竹林七贤》则巧妙利用田黄石料的颜色、形状、肌理进行创作，在密密的篁竹中，文士们或抚琴，或交谈，或振袖起舞。“弹琴复长啸”，晋代阮籍等七位文士狂放不羁的性格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乐最为业界称道的是田黄薄意《富春山居图》的创作。《富春山居图》为明代画家黄公望的传世名作，300年前被焚而成两帧断画，分别称作“剩山图”和“无用师卷”。20世纪中叶，“无用师卷”被运至台湾，从此两相隔离。经过大陆和台湾文化人的共同努力，2011年6月1日，两幅断画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名画分而重圆，其意义已超出画展本身。为庆贺这一盛事，文乐精心挑选了一块高宽10厘米左右的田黄石，以自己特有的精巧援刀技法来进行创作，按石形因势造境，立体演绎富春江景色。叠翠的山峦、宛转的江流、掩映在花树中的亭台楼阁以及应邀前来的文人雅士，皆历历生动。其构思精巧，刀法细腻，突破了传统雕画的局限。在雕件背面的下端，还阳刻一排竖读的清代梁诗正题画跋文及作者款识共251字。每个字尚不到一颗米粒大，肉眼可识。全文介绍山居图的画作缘由。所刻跋文，书体遒劲，与雕刻的山水浑然一体，让人称



《花好月圆人寿年丰》

叹。这件历时一年完成的作品，丝丝缕缕都浸透了文乐的心血，堪称当代田黄薄意雕的精品。

由于薄意雕刻对材质和工艺的要求特别严苛，因此当代专攻薄意的艺术家并不多，而文乐却毕其心力，执着于这门艺术，始终如一，不改初心。深藏于雅道巷的这间文乐薄意艺术馆，也因此让人瞩目。坚持和坚守，是一种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品质。石品、艺品相得益彰，寿山石雕为世人所珍爱，就在于此。

玉湖金峰

戴云飞

循着寻觅金丰故里的足迹，数度到嵩口镇玉湖村。

清乾隆《说岳全传》的作者是浙江仁和县钱彩，增订者是金丰。也有一些版本，著作者直接署名钱彩、金丰。

书籍匮乏的年代，以《说岳全传》为蓝本的戏剧、评书、连环画，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1

记得年少时，从同学处借得一本图书，封

皮、封底皆已缺失，没有书名，书中也多残页。同学说叫《岳飞传》，只借一天。夜里挑着煤油灯，通宵达旦，连读两遍，直把鼻孔熏得油黑，意犹未尽。而当读到岳飞冤死风波亭、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牛皋气死金兀术等故事情节时，小小年纪，竟是不能自抑，气血贲张，至今想来，记忆犹新。当年无书可读，偶尔读得一两本，皆印象深刻，犹以《说岳全传》为甚。

许多年后重读该书，心境见识已有所不同，感觉却并无不同。或许，所谓家国情怀，以及是非善恶观念，早已根植于心。可见一本书，对幼



稚心灵的影响有多深。

而将书的作者金丰与永泰联系起来，那还是近些年的事。其实，时至今日，知道金丰是嵩口玉湖人的，怕也无多。便如许多人不知道宋末诗人卢梅坡，就是嵩口卢洋进士卢钺一样。

2

永泰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月洲张氏、白云黄氏家族，固然是代有文章风流、忠义肝胆人物；麟阳鄢氏、卢洋卢氏，家族虽不庞大，不敢居后，亦是英才辈出。玉湖金氏，因着有了金丰，也足以在永泰璀璨的历史长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元幹、卢梅坡、金丰同为嵩口人，绝非偶

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说永泰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么嵩口，无疑是其中“地气”最重的一块。坊间传闻，唐永泰置县时，县衙设地就有嵩口与登高山麓两地之争。地理先生以井水“称重”定夺，登高山人作弊，事先在井水里撒了盐，结果可想而知，同样一桶水，从登高山麓水井里打出来的要“重些”，于是县衙就设在了现在的位置。这故事大抵为嵩口人杜撰。但撇开“地气”不说，嵩口的“文气”，确是要“重”一些。

3

金氏在永泰，只是“小姓”，仅在玉湖聚居成族，数百人口。金氏入闽始祖金衡，为闽王王审知外甥。王审知治闽期间，追随左右，职居中



书参军。金衡歿后，家族人丁稀薄，散居各地。清雍乾年间，居住福州北门外汤斜（今晋安新店汤斜村）的金彦卿、金纯卿兄弟，举家迁徙到嵩口关帝庙街，不几年，家族生意就做到了半条街以上，故关帝庙街又称“金半街”。清乾隆五年（1740），金纯卿再度迁居玉湖，为玉湖金氏先祖。

玉湖村临大樟溪，溪流流经村前，绕了个大弯，溪面宽阔，静若平湖，溪水碧绿如玉。玉湖名称，当是由此而来。溪边原有一条古驿道，驿道两旁是参天的古树，由嵩阳码头通往德化，水陆交通便捷。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金氏迁居玉湖，果然是“闪金烁玉”，家族兴旺，成一方望族。

金氏迁至玉湖，凭借雄厚的家财，延续家

族生意，并大肆购置山场田产，构屋筑舍。据金家分家的《闽书》记录，金丰离世时，已有佃户400余家，建有多座大厝。金家在玉湖，先后建有“瑞山堂”“珠琳堂”“紫山堂”“庆山居”“宁远堂”“致远堂”等数十座大宅，墙高院深，屋宇绵迭，雉堞相望，气象森森，形成一片独特的家族建筑群，在乡村里极为罕见。现多数屋舍虽已破败，周遭环境也已面目全非，但从保留下来较完整的几座宅院来看，拂去历史的尘埃，仍能感受到当年的庄重与辉煌。

4

金家在玉湖的老厝，由金纯卿子金惟昭建造，屋舍厅堂方正，左右对称，内敛向上，但已



倾圮，残留门前石阶、部分砌基。金惟昭子金士廉，仿老屋建瑞山堂。瑞山堂三落六扇，横厝距正厅 60 米远，前埕也十分朗阔，外埕还有月牙形大坪。瑞山堂虽仅存正座，残垣断壁中，依稀可见当初规模。清乾隆间某年，金士廉子长子降生于瑞山堂，取名宣，讳峰，也就是金丰（金丰生卒年待考，大约在 1772-1814 年之间）。瑞山堂厅前防溅墙头上，彩绘人物故事，花草虫鱼，下端各有一副对联：“春暖观龙变，秋高听鹿鸣”，“地以栖鸾胜，门因结驷高。”此二联，传即为金丰手书。

“入座衣冠礼乐，举头云汉文章。”瑞山堂的这副柱联，道尽了主人情怀。瑞山堂动建伊始，就在屋前左侧建“陶苑书斋”。书斋为两层建筑，二层阁楼供孔圣人像。书斋玲珑雅致，斋名也颇为讲究。“陶”，陶冶。

《旧唐书·刘禹锡传》“禹锡在朗州 10 年，惟以文章吟咏，陶陶性情”即为此意；“陶”，快乐欢喜也。谢灵运有诗云：“共陶暮春时。”“苑”泛指园林，后引申为文艺荟萃之处，如文苑、艺苑。书斋前筑石拱桥，旁种松树、石榴、

铁树，曲水流觞，鸟语花香，营造幽静愉悦的环境。金家崇尚耕读，“陶苑书斋”不辱使命，培育出众多士子文人，金家几座老宅前，曾有 8 对旗杆石。科举年代，一般是取得贡生以上功名才能立旗杆石，可见金家科举鼎盛。

金丰幼时在书苑读书，后又在书苑授徒，与书苑结下不解之缘。金丰虽只庠生出身，但文章学识，出类拔萃，书苑功不可没。书苑虽已弃用，主体尚在，殊为难得。书苑前原有一口水井，井水清澈，已埋没，整块石头打磨的井口，现保存于嵩口民俗博物馆。



5

玉湖寨又称珠琳厝，为金丰、金宝兄弟所建。珠琳厝先建主屋，后举全村之力，采鹅卵石建围墙。玉湖地处一片平畴，玉湖寨平地拔起，倒也巍峨壮观。玉湖也为盗匪猖獗之地，有了这一道藩篱，足以安民保境。作为庄寨，玉湖寨也是雕梁画栋，跑马道、斗形窗、射击孔等防御功能一应俱全，也并无独特之处。但因玉湖寨为金丰亲手所建，那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金家后来还盖了座紫山堂，200多个宽敞的房间，风火马头墙高耸，连廊九转十八弯，如迷



宫一般，现保存完好，也是民居建筑中的一块瑰宝。

金丰在玉湖金氏族谱里，写作金峰，一字之差，让学界产生些许困惑。其实这不难解释。旧时士子，视作小说为雕虫末技，多不署真名，因此，连《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身世，也成谜题。清代又是文字狱盛行的年代，思想禁锢的300年，读书人无不战战兢兢，文字狱冤案多不胜数。金庸先生的远祖查嗣庭在浙江任提督学政时，因太有学问，出考题时用了《诗经》里“维民所止”4字，大概是有考不好的学生告发，雍正皇帝看了，龙颜大怒。“维止”二字，不是“雍正”砍了头？结果是查学政被砍了头。金庸先生耿耿于怀，小说里一概的“反清复明”。乾隆年间，礼部尚书沈德潜写了首《咏黑牡丹》，其中有句：“夺珠非正色，异种亦称王。”诗被发现时，沈已死，仍然被开棺戮尸——我大清夺了朱明天下，你不甘心也就罢了，还敢把我满人称作“异种”？更有甚者，有两个小文人，一个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个写：“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也被砍了头。《说岳全传》在清代成为禁书，作者有所顾虑，也在情理之中，但还是在序言落款里，留下了“永福金丰”的线索。而玉湖金氏，更是代代口口相传，确信《说岳全传》作者之一，就是玉湖的“金峰”。

玉湖寨、瑞山堂已经败落，若能修葺为金丰故居，必能荣耀千秋。金氏后人，能人辈出，不知以为然否？

好官唐学仁

郭永仙

408年前，广西桂林兴安举人唐学仁千里跨省赴任，来永泰就任县长。唐县长到永泰后，编修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县志，扫黄打黑，治理社会治安，兴学重教，个人带头捐款，倡议修建文昌阁。在永泰三年，政绩显赫，被永泰人民广为点赞。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广西兴安人氏唐学仁高中甲午科举（见广西通志卷七十四），并被敕封文林郎。有了文林郎称号，就有了进公务员队伍的资格。当然，在历史上许多举人，虽被授予文林郎，却没机会入职，以布衣终其一生。

唐学仁是幸运的，在家赋闲多年之后，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接到朝廷入职通知书，被任命为福建省永泰县知县。接到任职令后，他辞别父母及亲人，踏上了跨省任职旅程。按现在的公里计算，从兴安县到永泰有1300多公里。一路上翻山越岭，舟车骡马步行并举，足足走了3个月！从广东入闽，然后到达郡城福州，在福州府报到，稍作休整。

两三日后，福州府派人同行，从仓山阳岐港

乘船，顺水扬帆舟自行，入江口逆流而上，沿大樟溪前行，一路上青山绿水，赏心悦目，虽不闻两岸猿声，却亦快哉！

舟行至汰口（今葛岭镇台口村）泊岸，上岸后步行，离县城近了。这么遥远的路途，对唐知县也是一次耐力与体力的考验。沿途风土人情也可略知一二。

天将擦黑时候，唐学仁一行经永泰县东门进城。东门称永泰门。县城有四个城门，还有三个分别为：西门永平，南门双清，北门通京。

自唐建县以来，没有城郭，明嘉靖三年（1524）知县何谦始请筑城。没多久何谦离职，



永泰极乐寺，万历年间由唐学仁重建

由继任张濬主持，逾年而建成。万历版县志记载：“石基土墉，厚一丈许，高一丈五尺，周七百二十丈有奇。……砌门以甃而楼其上，各三间。城之上串楼如丈之数。三十二年，知县文惠缮修四门。三十八年，倭寇攻陷，纵火焚三城楼及官寺民居不可胜计。”这些都是旧话，暂且不说。再说唐学仁一行进城后，天色正慢慢暗下，县城四周群山如围屏，城内小山上树林葳蕤，古木参天，樟树的清香扑鼻而来。此时城内三三两两灯火扑扑闪闪，店家都已打烊。街市少有行人，感觉县城十分萧条，气脉孱弱。

明嘉靖与万历年间，县城经过两次兵燹、倭寇掠城，人口锐减。万历版县志有明确记载：“宋朝，永泰户分主户和客户，主户九千五百八十一户，客户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户，一共二万一千三百六十户。按宋制，四千户为大县。明洪武十四年，户则有民、有军、有匠，合计六千九十二，人口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七人。正统十三年，沙县邓茂七为乱，其党西击永福，所过无少长尽屠之，邑遂残破。景泰二年，户仅一千一十八，口仅三千三百七十三。到万历四十年，户之增不能三百，口亦止于四千一百一十三。”

唐学仁一行来到县公署，稍作休息，县教谕伍可求陪同，到四周察看，并介绍了县署环境、办公用房分布。唐知县心情渐渐好了起来。他从县公署几幢办公用房的命名中，看出了永泰确实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县。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为官一任，一定要撸起袖子好好干，对得起永泰

的父老乡亲！

现在，我们跟唐知县一起去感受一下公署的办公氛围。永泰自唐建县，公署不断创修。公署各用房的命名颇有文学、儒学思想意味，比如有自公斋、虚心堂、紫微堂、思政轩、读书轩。正堂之西的监狱叫无讼堂。北面的几幢则叫絜矩斋、浮香室、桂林亭、野意亭、学爱堂、美景堂等，而县署之东数百步建有浩然阁……后来，唐学仁倡议修建文昌阁，于沙湾外，临大樟溪而筑。唐知县带头捐献俸禄，全县官员百姓纷纷响应，为古县再添一景观。

小城与唐知县老家有相似之处，城内有山，山都不高，最高为东皋山，主峰鸚峰，在城中县署之左，山顶古松参天，夜深人静时，时有松涛阵阵，在县公署内便能听到雄浑的涛声，还能闻到松树的体香。冲峰在县东门外，建有重光寺。唐知县来永泰有几天了，早出晚归，入户走访，访问遗老智者，到店家集市调研，对治理这个被洗劫过的小城有了思路。

首先从民生入手，治理县城治安，整肃生活秩序，重振商户集市。那时县城不大，城中只有五条街，五街为县前、东门、东皋山、北街、西门，城外还有二街：东门外、南门外。城中有八巷：新安、土地、许厝、杨巷、府馆、玄坛、虹井、古井。教谕伍可求、训导谢必敬陪伴考察。这两人都是文化人，来永泰有两三年。唐知县喜欢文化人，整顿县学也要靠他们，这是后话。

永泰是有幸的，几任知县都是举人出身，

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唐学仁的前任、南昌人袁世用，也是举人出身，曾在县城展开扫黄打黑行动，对县城丑恶现象进行了打击。随后唐学仁也大刀阔斧进行变革，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振奋大家的工作热情。被请来修志的福州庠生陈鸣鹤，对唐知县是这么评价的：“唐侯因其威严而承以宽，宣教化，上礼让，镇抚百姓，恩施甚厚。”

现在要讲一讲修志了。这是前无古人的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永泰自唐永泰二年（766）建县至明万历年三十八年（1610），800多年间一直无县志。唐学仁任职时，深感修志是当下一件紧要的事。可是县财政空虚，民殫于力，何敢做无米之炊？感到困难而踌躇。某一日在街市上看到长乐人谢肇淛编写的《方广岩志》，人人都在争读，有人形容一时呈纸贵，不减洛阳书也。市民对唐知县说：“岩可志，邑独无乘耶？”唐知县答曰：“邑故无乘，而永之急者不止一乘已。”

唐知县感到，永泰人文荟萃，代有贤人，山川锦绣，只可惜县内经两次屠城，人才稀缺，难找到担当修志之人，同时又无典籍文献可依。于是，开过常委会，决定延请文学家、任过广西布政史的谢肇淛部（即谢肇淛）、深得

诸多掌故的陈鸣鹤、徐爌来编纂县志。这三人虽不是邑人，却都是福州地区人，并且对永泰山水非常熟，常带友人游览方广岩、姬岩、名山室，都留有诗文，至今还能在这些名山上找到他们留下的字刻。

谢肇淛、陈鸣鹤、徐爌三位名士来到永泰，志趣相投。有天夜里与唐县令聊天，谢先生先行发言：“永故无志，唐宋故实，仅仅见梁叔子《三山志》中。国朝正德间，邑人林仪有《永阳清气录》，其言具而未文，前后郡志亦多仍之。迨及兵燹，城邑为越，世家古壁之藏，荡然无复、孑遗矣。”是呵，谢先生在话里透露了一个线索，曾有一本《永阳清气录》对本邑人文掌故有详细记录，可惜被毁。

修志虽然没有现成的资料，但林仪所作《永阳清气录》一书，还是有一些轶稿散落。几位修



永泰方广岩

志先生根据残页加以研读核实，慢慢有些思路。

林仪何许人呢？林仪为宋代隐士林学蒙九世孙，字正夫，亦以道学自命。

林学蒙此人也必须说一下。林学蒙，永泰人，字正卿。生卒、故里均不详。从朱文公学，筑室今红星乡龙门三滩下，不务俗学，专注理学，乡人皆师尊之。后卒業黄榦门下，与黄榦亦是朋友。黄榦作《龙门三滩记》（见明万历版县志）。林学蒙无意功名仕途，隐于乡间，在居所四周遍植梅花，颇似卢梅坡，著有《梅坞集》传于世。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宋闽县（福建福州）人。少师从朱熹，后成为其女婿，并被朱熹视为道统继承人。

黄榦在《龙门三滩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从中看出林学蒙应是红星人，或仅居于龙门。“吾友林正卿所居之乡，山曰鼎峰之山，折为二支，东西迭起，仰而相同，俯而相就，卒以交互而相入。梅溪之水，沿山而流……”

修志之前，他们常常探讨如何编纂，并进行了分工。陈鸣鹤、徐炯日夕编摩，采访遗老，询问道路。编志是个很严肃的事，一些道听途说的事要进行核实，有些地方还要去勘察。谢肇淛在《修志小引》中感言：“地不遗鼠壤，人必及刍蕘，取材于陈编，定体于往哲，宁质无华，宁核无舛。为纪者四，为目二十六，盖不阅月而竣事焉。永人尚重节气，重然诺，尊信所闻，不敢有枉于是非，亦无旁观而掣其肘否。故议不繁而成

功倍也。”

陈鸣鹤也在《修志小引》中对编纂永泰县志发表感言，同时对唐学仁修志之事大为称赞：“唐君侯，千秋士也。令永福三载，民皆乐其生。政既成，而为邑计千秋，乃以志请于谢缮部在杭、鸣鹤及徐兴公于草泽之间，以佐研席。鸣鹤让垓壤故实，徐在杭（徐炯）汇编古今诗文，缮部（谢肇淛）则载之以义，笔削之。缮部，良史也。其义渊奥，非鸣鹤所能与。”

谢肇淛对永泰人淳朴义气，没有人在旁指手画脚干扰他们，表示出敬意。而我们可爱的唐县长也曾专门放下公务，陪谢肇淛、陈鸣鹤、徐炯考察了高盖山、方广岩等县内名胜，为古迹、山川部分考证有关史料。考察归来，唐县知县诗兴大发，分别吟咏方广岩与高盖山，现不妨录于此供大家赏读。

高盖山（二首其一）

萧萧黄叶蔽琳宫，飞蹬巉岈第几重？
萝薜何年侵古洞，烟岚顷刻幻高峰。
禅关不锁僧悬衲，仙迹犹存鹤舞松。
万业已空浑出世，坐来云外一声钟。

游方广岩

晓入深林开宿烟，崦嵫峰壑吐青莲。
千盘曲蹬通禅室，十亩寒云覆石田。
乍识香霏檐葡雨，已疑身在蔚蓝天。

翛然杖底悬青汉，笑隔黄尘出大千。

修志始于万历四十年（1612）六月，越月而竣事，仅花了一个月时间。从唐知县后记落款能看出来。随后交工匠剞劂刊行。镂版若干幅，藏于县公内。

县志修竣，按惯例，也请名人作序，序一作者周之夫，万历三十五年（1607）知府，湖北麻城人。周之夫在《永福县志序》中写道：“唐令君莅永之三年，而永大治。其始犹与民相约以科条，久之直相信以肝胆，蒲不待鞭，象无庸画于都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卓茂鲁恭，方斯蔑矣。政成之暇，搜缉邑志，未移时而竣。……楚西陵周之夫书于三山之本官清署”

看落款，周之夫应是福州知府。查找了《三山志》等有关福州知府信息，并无周之夫，湖北麻城县志也只记载周之夫为知府，具体为何处知府，未记载。古时由于通信交通不便，许多信息无可证实，留下不少悬疑。

序二作者陈长祚，长乐人。隆庆五年（1571）辛未进士，在多岗位任过职，官位显赫。这在序末落款处写得很清楚，此君最后官至工部尚书。这个序作于万历四十年（1612）冬。从陈长祚作序时间可以推断，县志到春节后刊印。两篇序文、两篇后记日期都是阳月朔（即农历十月初一）。陈长祚对唐学仁修志大大点赞，在序中写道：“由一县一郡以知天下，由一日以足千秋，余于是益嘉令君之治有成绩……”

唐学仁来永泰干的第三件大事是兴学。他知道从娃娃抓起的道理。振兴儒学，重振县学。永泰自唐建县以来，都重视教育，学校就建在县公署旁侧。嘉靖五年（1526），学宫倾圯，知县龙宣和以刑家者言，迁学于东皋山之麓。万历二年（1574），知县陈克侯亦以刑家者言，复还旧址。

唐学仁在巡察学校时，发现学校破损，已是危房，急需加固修缮。囿于县里财政困难，他自己奉出一个月俸禄80两银子，民间集资500百银子，开始动工修缮。修缮过程，看看陈鸣鹤还原当时情景：“……与邑博士王、谢二先生，鸠佣计直，度木凝土，易其腐，支其倾，葺其漏罅，新其埃墨，学遂巍如焕如。而王先生以迁去，代者伍先生，遂与谢先生师弟子讲业其中。侯则每视簿书毕，身亲往临，发明经艺，序其指意，诱进圣贤之道。因选经明行修者，待以殊礼，即下材不逮，亦谆谆为之训，教出于至诚。由是，邑里大化，文学、儒者，皆居然为公辅之器。夫平畴堡治，乃殖嘉禾，浚池疏沟……”（见明万历版县志陈鸣鹤《唐侯重修永福县儒学记》）

我们可爱的唐县令是个有情怀的人，万历三十九年（1611），在通往西山片的曹溪桥上建亭，类似廊桥，可供过往行人避风雨。在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突遇暴雨风雪，桥亭无疑是个温暖的地方。

唐学仁在永泰为官三年，与百姓打成一片，政绩斐然。离任时，百姓倾城相送，传为佳话……

闽地“边城”

曾建梅

溯溪而上

福建多山，连绵的深山里藏着许多宁静古朴的小村落，这些村庄大多远离都市，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当中，仍保持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村文明。嵩口，就是一个这样的所在。从地图上看，它处在福州永泰县的西南方，大樟溪的上游。发源于德化县赤水镇戴云山的大樟溪一路逶迤奔流，途经永泰县境内的泮口、嵩口、梧桐、

赤锡、富泉、城峰、樟城、葛岭、塘前等村镇，在闽侯南通与闽江南港相汇，从福州闽江口一同奔向浩瀚的东海。人们常说因水而生，因水而盛，正是得益于大樟溪长年繁盛的水运之便，嵩口成为这条水路上游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与集镇。邻近嵩口的尤溪、德化、仙游、莆田等地的物产都在这里完成交易和囤积。早在南宋时期，这里已形成一个繁荣的小集市。元代置镇后，嵩口更是成为周边地区的重要客流与物流的集散地，现存的直街、横街、米粉街、关帝庙街、大



埕街等古街有上千米长，两侧的商铺仍保留着当初的建筑格局。

丰沛宽厚的大樟溪涵养了这一片水土，养育了勤劳的人民，这片土地给予人民丰厚的回报。作为农耕地区的嵩口物产丰富：番薯、笋干、李干、青梅、竹子，尤其溪畔沃野茁壮了大片林区，依靠

丰富的木材资源，嵩口成为福州下游重要的木材供应基地，也因此诞生了诸如陈家、林家、郑家等为数众多的商人家族。今天所能看到的精美古民居大多为这些家族所建造。不仅如此，大樟溪的溪水还解决了运输问题，把这些壮硕的木材送到入海口，再换乘货轮运送出去。

遥想一下，在陆路交通尚未健全的年代，大樟溪畔的嵩口古渡何等热闹：等待漂放的木排，聚在一起即将出行的船工，来往的商贩……古码头上那棵大榕树曾经荫蔽多少码头上的辛苦人，他们在这宽阔的绿荫下抽烟，说笑，忙碌，歇脚，成筐的李干、柿饼、青梅、竹笋、茶叶以及堆积如山等待漂放的木筏，共同构成了一幅古渡



口繁荣熙攘的图景。

流金岁月

而今商业的潮水退去了，街面上的鹅卵石被岁月打磨得愈加光滑发亮，一阵小雨下过，更是透出幽冷的微光，像被油浸过一般。两边老式的木构楼房临街的一楼作为店面，有的木板已微微倾斜，挤挤挨挨，相互之间支撑着；二层多为住家，有的还向街心支出一部分，形成一个小骑楼。看起来有些冷清的老式理发店、小吃店、裁缝店、香烛店以及嵩口古老的手工艺竹编店，依次排列着。所谓的古街，大概就是除了古旧的建

筑以外，那些未曾被光阴改变的古老行当和手艺人仍然顽固地坚守着，未因外界飞驰的速度而改变。因了这些店铺的存在，嵩口给人一种可以静下来慢慢体会时光流逝的悠闲。

建于明清时期的嵩口古厝星罗棋布，散落于山涧河边，田野地头。下坂厝、端公坂厝、继善堂、承善堂、叶庆厝、拔魁厝……多达100余座，这些大厝的主人大多都有从商的经历，且多从事木材经营。深入探访，每一家每一厝的老人都有着流金岁月里动人的传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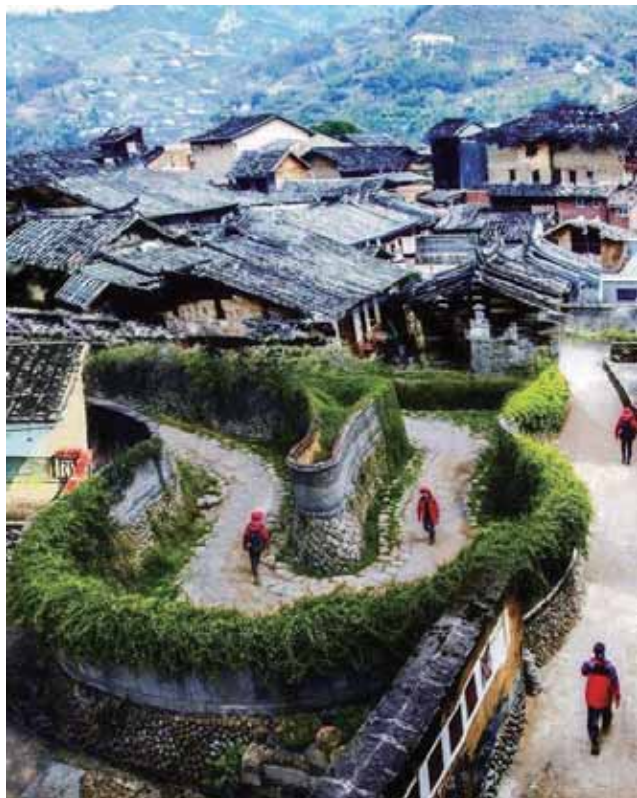
时过境迁，当初兴建大厝的主人一代一代老去，新的生命又在这老屋中诞生；老宅见证了一个个家族的生生不息和生命的接续繁衍，当然也

见证了每一代所经历的社会变迁；经过几十甚至几百年的风雨侵蚀，有的墙面所贴的青瓦衫都剥落了，裸露出泥土的黄色；有的楼梯都歪斜了，人走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有的后人已经搬离了老宅，只剩一架空屋矗立在村庄当中。在翠竹梅林的掩映下，一座座黑瓦泥墙、檐角高企的古典民居让人仿佛回到了一两百年前的时空。

人情不老

如今青壮年大都离开嵩口到了外地经商、工作、游学，留守在家里的老一辈人成为嵩口数量最多的居民，尚未完全掌握QQ、微信等现代化通信手段，他们在每个月的赶圩之日互相交流着信息。嵩口本地话将赶圩称为“交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十里八乡的乡亲就会赶来凑个热闹，一边逛逛圩市，一边互相打听家长里短，确实是“交流”二字最真实的体现。

一到赶圩时，嵩口大桥头两边摆满家禽家畜，扑棱棱的活鸡活鸭，沿新街一路而下，两边零星摆着芦苇干草或竹枝制作的扫帚和毛刷、斗笠、簸箕、扁担、木桶、木椅等手工制品；农民带来最新鲜的蔬菜、水果，就摆在路边任你挑选。新晒的笋干、李干、菜干、梅子，一把一把，一筐一筐，总会让人忍不住拿起来嗅一嗅其中隐藏的乡野芬芳。沿街的小吃店此刻是最忙碌的时候，沸腾的大锅里冒着热气，扁肉、拌面、蛋燕、粉干、白粿等等花样繁多，走进去，点上



一两样，和乡亲挤坐在木桌上，等待老板娘端上桌来。有时候看看邻桌点了什么，很好吃的样子，自己也忍不住来上一份儿。再往菜市场方向走走，更是热闹丰富，鸡蛋、鱼干、海鲜、活鱼、蔬菜等等，总是看到这个也想买，看到那个也想买。习惯了大型商场超市里整齐划一的货物的城市人到了这里总容易获得惊喜。和大型商场里推销小姐们职业的微笑不同，老乡们乐意跟外来的游客们交流搭讪，聊得高兴了，筐里的地瓜、李子、梅子送你一捧也是常有的事，反正是自家种的，多一点少一点并不那么计较。古镇所保留的不光是灿烂的古民居文化，更是一种源自乡村社会的珍贵的人情味儿。

年轻的力量

或许是因为嵩口地处永泰深山，在依靠陆路交通的今天，大樟溪的水运优势已经不再，从福州驱车至嵩口，来回一趟得三个小时，且班车较少；嵩口古镇的景点又分布在各个村落，若非有车族自驾，否则去一趟确实不易。这大概是造成了嵩口近几十年岑寂和没落的原因。但恐怕也正是由于这种距离，城市化的巨轮才较少地碾轧侵扰到这个深山中的古镇，让它还保留着古朴自然的样貌。

和中国千千万万的乡村一样，嵩口古镇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都选择了到大城市定居，村中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儿童以及一座座空出来的

老宅，这让很多心系故乡的嵩口人百感交集。

2015年，通过政府部门牵线，来自台湾的“打开联合”文创团队入驻嵩口。这是一群全由年轻人组成的设计团队，成员大都是90后大学生。当一个上千年的古老村镇遇到一个来自海峡对岸的年轻团队，会撞击出怎样的火花？他们的到来能为这个古镇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呢？

“我们所要做的并非是让嵩口变成人潮拥挤的旅游景点，我们只是想让这个千年古镇恢复活力，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复兴……如果把周庄、丽江、凤凰古镇比喻成99度的热门景点，我们嵩口



只想建成与人体体温一样，让人觉得温暖的37度古镇”——这是来自台湾的主创人员和嵩口管理者达成的共识。

去嵩口游玩的朋友必定会去曲折如鹤颈的鹤形路上走一走，那沿路的鹤形墙上已经爬满了绿萝，焕发出一片生机，成为嵩口古镇的标志。但改造之前的小路坑坑洼洼，两侧墙体坍塌了大半。为了修复这段古墙，与当地的土墙在颜色质地上相融合，“打开联合”的工作人员们执着地寻找当地传统技法夯土墙的工匠，走访了整个镇区所有会筑墙的老辈人。但是20世纪90年代，由于没有生存空间，有这种古老技艺的工匠都改行了，连做夯土墙的工具都没有了。对于古老技法的执念让他们不放弃，最后由政府出钱，按照老一辈人所描述的方法重新制作了一套工具：墙斛，墙杵，斛箸……交给施工队去尝试。设计人员和当地的工匠一起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选用不同来源的泥土和配比，不断试验，造出理想的接近原来的泥墙，鹤形墙得以恢复。

类似的改造项目还包括对老街店面的修复，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建，沿街排水等公共设施的整理。在台湾团队的帮助下，嵩口的改造体现在每个微小的细节当中。随处可见的绿植、花草、竹制长凳，经过翻新的整洁的公共洗手间以及河边的复古竹筏景观等等，几年下来，嵩口当初的泥淖满街、老屋倾斜的破败景象焕然一新，荒草丛生的古渡口也成了本地人和外来游客悠闲地散步拍照的景点。曾经在大樟溪中沉睡千年被冲刷得

光滑洁白的鹅卵石，有了更加广泛更加令人会心的用处，沿河长长的堤岸全部由溪中卵石堆叠而成……艺术与设计的这些古老事务被唤醒，与崭新的时代通上了气口，活了过来，且如此鲜活蓬勃。

如果说对于外部景观的改造是我们一眼即可发现并惊叹的，那么，对于人文环境的改造却是需要深入当地慢慢体会和感受。

“打开联合”团队的设计人员在对嵩口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进行调查收集的基础上，帮助当地特有的手工艺产品设计品牌故事、包装：藤编手提箱、竹编灯罩、手工艺帆布包、棉麻筷套等富有温暖手作气息的产品皆出自当地工匠之手；农家自产的花生、茶油、地瓜粉、蜂蜜、青红酒、李干、梅干、青梅酒等等，套上满含乡土风味的文创包装袋，摆进了“打开嵩口”“松口气”的特产展示柜，很受外来游客青睐。这些产品不久还将在位于福州市中心的永泰旅游推介中心进行展示和销售。在刚刚过去的夏季8月，这些独具乡土气息的嵩口风物连同展示柜都被搬到了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中的鄢家花厅进行展示，特意从嵩口人家家中搜罗的年代久远的线面架也一同搬进了花厅的天井，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知道了在福建的深山中有这么一座充满了故事的古镇。

设计团队还以本地芙蓉李、胭脂李、青梅等优质李果为基础，开发出“李子酥”“梅子饼”等特色食品，用嵩口特有的鱼腥草、鬼针草调制出年轻人喜欢的奶茶……所有这些极富创造力的

尝试都让本地物产穿上了时尚的新衣，有了新的生命力。

如果说嵩口是一个上了些年纪的老人，那么每一户村民都是这个身体里的细胞，每个人都有着向好的希望；在这些外来文创者、年轻人的激发之下，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动起来，开始逆生长。而这些来自台湾、北京、贵州等地的外来创客，也渐渐因为喜欢这里的风土、古厝而喜欢上了这里的人。看着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创业工作，共同为着古镇的一草一木、一阶一石奉献着热情，村民们也为之感动。时间久了，彼此熟了，地里种的青菜、地瓜，竹林里新挖的春笋，树上采摘的李子，自家酿的梅子酒，热情的村民都愿意给这些可爱的年轻人随手送上一份。

看着这几年嵩口的变化，一些在外打工或经商的年轻人也慢慢有了回乡创业的打算。有的把祖屋翻新开起了民宿，也有的回家开起小店，经营农家土特产。或者就是在老屋门口摆上嵩口当地的小吃，满洲糕、绿豆糕、九重粿、水晶饼……每有游客路过，他们都会热情且自豪地招呼着：“进来尝一尝吧，我们可是上过央视的哟。”他们发现，不必沿袭上一辈躬耕田亩的辛劳，也不一定远走他乡，就在家门口或许也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边 城 之 美

如果偶尔厌倦了古街上的热闹喧腾，不妨

从直街往外走，穿过德星楼，下阶梯，便可一下子进入大樟溪的怀抱。布满了光滑鹅卵石的河滩会令人一下子安心下来。在嵩口找间民宿住上几日，从清晨到日暮，仿佛时光可以更加具体更加切近地被感知。入夜的嵩口令人想起儿时的故乡，偶尔犬吠一两声，使夜色显得更加安静。这温柔的夜色会让人想起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想起那些停泊的小船，岸边人家的大声吆喝，托远行的船工捎带一斤红糖、一斤白糖；想起那只在夜色中咩咩叫着的小羊……一样的临水而居，一样的古渡口和船工，甚至一样的有着磨坊、油坊，也一样有一条可以通向大千世界的溪流……

清晨的嵩口又不一样。朝阳升起之前到溪边走一走，晨雾横在朦胧的溪面上。隔着安静的溪水，对岸一排明清的小楼像吊脚楼一般悬在半空中。山林里早起的鸟儿比赛一般地叫着，嘈杂又空灵。常有妇人在溪间浣衣或者洗水桶，她们蹲在溪中的礁石上，背影健硕而坚强，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感动。中国的乡村真是美啊！村中的这些人真是美啊！而日渐城市化的中国，许多乡村注定要消失。这真让人伤感。幸好嵩口是倔强的，嵩口人是倔强的，来嵩口一起改变和复活它的人都是倔强的。他们尝试着扭转这个古老村镇行将没落的命运，让它焕发新的活力，让这古老的、历经了多少年风雨而未被摧毁的乡村之美，让大樟溪畔这些灵秀的乡野，好好地活下去，好好地美下去，一千年，一万年。

砂拉越诗巫福州人再移民

——以澳大利亚珀斯及塔斯马尼亚岛屿为例

（澳大利亚）林芳燕

从福州到诗巫

华裔涌入砂拉越起源于跌宕起伏的 19 世纪中期。1900 年，福州领袖黄乃裳响应第二代拉者查尔斯·布鲁克大量吸纳华工的计划，于 1901 年引进了 1118 名福州垦民来到砂拉越诗巫的拉让江流域进行垦场开荒。

初期的垦民开荒生活十分艰巨，除了不适应新环境及贫瘠的土地，也时时面临热带季候风、倾盆大雨，森林里成群结队的老鼠咬啮及昆虫、野猪、蛇和鸟类的蹂躏。此外，雪上加霜的霍乱夺去垦民生命。4 年后，种种的波折导致约 200 名垦民死亡或逃往古晋、新加坡及实兆远等地。面临窘境的垦民寻求黄乃裳的协助，然而黄乃裳因资金匮乏而实行征税计划，这导致垦民不满。



黄乃裳

加上黄乃裳强烈反对鸦片和赌博行业，致使他被当时的鸦片商及殖民地官员视为眼中钉。太多反对的声浪，让黄乃裳认为明智之举就是返回中国。在确定替代他的富雅各牧师是个值得托付及信任的领袖后，黄乃裳于 1904 年挥手道别诗巫垦场。

富雅各牧师的适时抵达并成功劝说拉惹豁免

贷款金，不但挽救了近乎瓦解的诗巫福州垦场，而且使它迅速地发展起来。1904年，富雅各牧师引进了橡胶种子，教导垦民如何种植橡胶树及扩大拉让江流域的橡胶园，进而巩固了诗巫福州人在砂拉越的经济地位。

在富雅各32年的带领之下，诗巫福州垦场不但成功发展，而且逐步扩散至拉让江两岸及砂拉越各个省份。诗巫福州垦民经历了布鲁克政权的统治时期、日军南侵沦陷时期、让渡为英属殖民地时期以及马来西亚联邦时期的四个政权更迭，可谓历经沧桑，变化急遽。

117年后的今天，诗巫福州垦场稳健发展，福州籍人口迅速增长并成为砂州最大华人方言族群。2010年的马来西亚人口统计调查显示，全国35万的福州人中，砂拉越就占了21万，诗巫占了93000多人。诗巫福州人的谋生方式也由糊口的稻米种植，成功转向胡椒、橡胶、伐木业及造船业等，乃至今日享誉各方的多元化、集团化、



诗巫大伯公庙，见证了诗巫华人百年间的奋斗历程

全球化的企业经营。

回溯开荒伊始，福州前辈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地开拓这片疆土。从原乡的依恋到对马来西亚国土的认同，经过一段复杂的感情转换，他们对诗巫的本土精神从疏离到亲密并积极投入国家建设。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秉承福州人天性爱闯荡及不安于现状的精神，大批的诗巫福州人又开始移居至世界各个角落，这种迁移的热潮大约起自20世纪60年代。

放眼纵观，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诗巫福州人的足迹。远至欧洲各国、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甚至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近至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都可找到诗巫福州人的踪迹。

诗巫福州人远赴海外的因素众多。有的移民是为了让子女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有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有的追求更有质量的退休生活，有的是为了和家人团聚。他们的再移民，将现居地视为永久的家园，新的认同感逐渐萌生，日久也就

由他乡变故乡。

从诗巫再移民至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介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拥有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等岛屿。其总面积为 761.79 万平方公里，其中 70% 为沙漠和半沙漠。澳大利亚为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亦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英语是澳大利亚最普遍的语言，其他通用语依序为意大利语、汉语、希腊语、越南语等。社会学家把澳大利亚这典型的移民国家喻为“民族的拼盘”。自从英国移民踏足澳大利亚之后，来自世界 120 个国家的 140 个民族先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发展和谋生。多民族形成的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其中以英国文化为主流。

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可以追溯自 1810 年。早期只有零星的中国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其中有东方绅士之称的广州人麦世英被认为是第一个到达悉尼定居的华人。随着大量金矿的发现，截至 1857 年，全澳共有 4 万名华人矿工，之后还不断增加。2017 年人口统计，澳大利亚全人口 2400 多万，其中华裔接近 122 万。澳大利亚华人包括来自中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的第一代群体及他们的后代。大多数澳大利亚华人选择定居澳大利亚东岸的大都市，其中包括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

诗巫福州人从诗巫出发来到澳大利亚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福州先贤明白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拼尽全力将子女送往国外以获取更先进的知识。除了祖国之外，他们通过各渠道将子女送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带领诗巫福州先贤迈向发展之路的富雅各牧师，除了为福州人奠定牢固的教育根基，还扮演沟通桥梁角色，让更多福州子女通过教会推荐前往海外接受高等教育。

在澳大利亚，最早及最多福州移民所在地乃东部的墨尔本，珀斯居次。其他可找到砂拉越福州人踪迹的城市为布里斯班及阿德雷。20 世纪 50 年代末，富雅各牧师的太太玛丽·富雅各因为哥哥在西澳珀斯的关系而迁居至西澳珀斯并在此终老。同一时期，来自诗巫的福州青年前来珀斯深造。自 1904 年起就在诗巫生活了 45 年的玛丽·富雅各和福州人建立了犹如家人般的亲密关系。她迁居到珀斯后，与来自诗巫的一批年轻学子继续维持着当年在诗巫的亲密关系。学子们每周末前往老人安养中心陪伴和照料玛丽·富雅各，用



福州话和她聊天，直到玛丽·富雅各于1962年8月3日离世。

在澳大利亚的砂拉越福州后裔接受高等教育后成为专业人士，他们也在这里成家立业并把家属接来澳大利亚生活，在赓续福州文化之余也成立了澳大利亚华人卫理公会。教会由开始到2018年拥有23间教堂及9间布道所，还拓展到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可见其影响力巨大。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的会督及牧师约80%是来自诗巫的福州人。

由于矿业的发展，西澳可谓澳大利亚经济最蓬勃发展的州属。截至2018年5月，全珀斯总人口约214万人，诗巫福州人则只有2000多名，所占的比例很小。笔者多年勘察研究显示，诗巫福州人选择居住珀斯基于以下几项因素：

第一，珀斯距离马来西亚最近。珀斯到吉隆坡的航程约5.5小时，从吉隆坡再衔接往砂拉越的航班，全程不超过8个小时。对于经常往返的商人或移民家庭而言是最简短及最便利的旅程。

第二，矿业的蓬勃发展间接地为珀斯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在西澳珀斯就业的福州人，超过70%受过高等教育，多从事医生、药剂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矿业技术人员、厨师等职业。此外，从商者则进驻房地产业、饮食业、旅游业及经营亚洲杂货店等。

第三，珀斯清新的空气、齐备的公共设施、较高的人文素养及有规划性的城市发展吸引了许多海外移民。即使每年夏季酷热无比，来自热带



地区的诗巫福州人也能适应。

第四，珀斯乃福州人密集之地，容易找到归属感。对于新移民，福州同乡特别给予关照及指引，对前来深造的福州学子也提供亲人般的关怀。

第五，澳大利亚华人卫理公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在海外，笃定的宗教信仰拥有着强大的力量。教会的会友以砂拉越福州人居多。牧师们多源自砂拉越或曾在砂拉越多年，对于福州人的生活习俗了如指掌，因此非常容易与教友们沟通。教友们相聚时以福州话进行交流，让福州人有归属感。

第六，在珀斯，不论是儿女婚嫁、新生儿诞生弥月、新屋迁居还是各节日的庆祝活动等，福州人都延续了传统习俗，让福州文化在他乡得以代代赓续。

第七，福州话扮演着重要角色。年轻一代的福州人虽然已不擅长讲福州方言，但年轻父母会要求公公婆婆尽量以汉语或福州话教导儿孙，进而让方言得以传承。



福州人在当地开的餐厅

第八，福州美食在珀斯得以扎根并发扬光大。单在珀斯就可找到7家福州美食餐厅，其中以诗巫福州人经营的“厨香”最为地道。“厨香”除了在珀斯拥有3家分店外，也分别在澳大利亚东部的墨尔本拥有两间分店，在布里斯班拥有1间分店。从当初小小的一间餐馆到今天的6家分店遍布澳大利亚各城市，可见福州人的勇于拼搏及维护福州文化的精神。

在澳大利亚，福州人一样可以吃到家乡口味的拌面、炒面、焖面、光饼、马耳、鼎边糊、蛋燕、糟菜粉干等各种福州美食。餐厅里售卖的食材多进口自诗巫。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客，通过福州美食加强了对福州或诗巫的认识。餐馆里所张

贴的拉让江或诗巫街景照片，间接向世界各地食客述说着这份浓浓家乡味。经常往返砂拉越与珀斯的福州人更是趁回乡之际带来许多福州乡味小吃，与异地的同乡共享。

近年来，珀斯的福州移民人数节节攀升。除了墨尔本之外，珀斯已超过其他省份成为最多砂拉越福州人居住的地方。

诗巫福州人在塔斯马尼亚

塔斯马尼亚是一个脱离澳大利亚本岛的美丽小岛，岛上人口约52万（2017年），其中98.5%居民为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后裔。选择定居在岛上的华裔人口可谓非常少，而福州人更是屈指可数，大约只有百人。

比起珀斯，诗巫福州人比较少选择定居于塔斯马尼亚岛大概基于下列因素：

第一，路途遥远。从诗巫起飞到抵达塔斯马尼亚岛，移民们要先抵达墨尔本或其他城市，再转机至首府霍巴特或朗塞斯顿，全程需乘搭3趟班机，耗时十多个小时，舟车劳顿。

第二，塔斯马尼亚岛固然景色秀丽，但气候寒冷，长年处在低温气候。最舒适的夏天气温为20多度，冬天却极度严寒，这对诗巫福州人来说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第三，长期以来，塔斯马尼亚岛经济处于低迷状况，就业机会比较少。然而源自诗巫的大安集团在塔斯马尼亚岛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诗

巫大安集团在塔州拥有两间板厂。位于西北部史密斯顿所开设的三合板厂于2015年8月7日举行开幕仪式。这间规模庞大的工厂将岛上所收购的桉木加工成三夹板后再运回诗巫大安板厂，出口至日本。大安板厂在塔斯马尼亚岛的设立获得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也给岛上的居民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虽然创业过程曾遭到绿色环保人士的抗

议，可是它无疑带动了塔斯马尼亚的经济发展，也让诗巫福州人在木材领域的专业技术得以在岛上及澳大利亚国土获得技术转移及交流。

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诗巫福州人为数不多，最大原因是难以找到一份安定的职业。根据笔者田野考察，塔州西北仅有5户来自诗巫的福州家庭及数位技术人员，因大安板厂在此设立而长期工作定居。这其中有3户为大安板厂员工，1户在塔州西北的伯尼经营咖啡馆，另1户则在医院担任医生。

首府霍巴特是岛上最多诗巫福州人居住地，其次为朗塞斯顿。岛上福州人多经营餐厅或咖啡馆，也有教员、医生、药剂师、产业经纪人及牧



大安板厂

师。

纵然隔着千山万水，福州文化一样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延续。婚嫁喜庆都遵循福州习俗，家乡美食如福州红酒、红糟一样仍在酿制。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制造家乡美食的食材比较难寻，即便从家乡带过来也必须通过海关的严格审查。然而，这一切都阻止不了岛上福州人对家乡美食的眷恋与传承，他们通过网络交流传授家乡美食的制作技巧。

塔斯马尼亚虽然是一个偏远的小岛，然而其绮丽的景色、丰富的农产品、淳朴的民风、开放的移民政策及塔州大学的教育资源吸引着更多华裔及福州后裔选择移居这个有福之岛。